

第二章

時代弄潮



五四健將羅家倫傳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內憂外患，當時清王朝中的有識之士開始尋求變革圖強之道，其中包括教育改革。朝野開明人士一致認為三大當務之急是介紹西方新學識，創立新式學制以及派遣青年才俊到西方強國留學。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設立官書局，延請外國人選譯書報並兼授「西學」，同時左侍郎李端棻上書請立大學堂於京，得到朝廷首肯，這些都為近代中國的教育、思想和文化開創了新的契機。京師大學堂即日後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諸多人物和事件匯聚的中心——北京大學的前身。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傅斯年、羅家倫等人都是這一契機的受益者。羅家倫之女羅久芳這樣寫道：「就在這一年（指前述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設立官書局，及左侍郎李端棻上書請立大學堂於京——著者按），傅斯年誕生於山東聊城縣，次年羅家倫在江西南昌出生。在中國國運最苦難的時際，他們兩人可以說得上是『生逢其時』，因為在新舊交替之際，他們首先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再及時進入新式的中等學堂，最後考取了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畢業後又順利出國深造，各在西方遊學六七年之久，奠定了學識的基礎，並開拓了文化的視野。」¹這段話裡所言「生逢其時」，除了晚清教育改革的契機之外，還應包括傅、羅考入北大時又適逢蔡元培入主北大，極一時之盛，成就北京大學的黃金時代，更形成著名的新文化運動，一時眾多的時代精英、青年才俊都投身到這一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甚為深遠的運動當中。傅、羅諸人更是其中佼佼者。

羅家倫一九一七年進入北大，從此嶄露頭角，可謂是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出場。對現代文學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潮》雜誌，對中國現代政治和歷史影響重大的五四運動來說，羅家倫都是

1 羅久芳：《傅斯年留學時期的九封信》，臺灣，《人物》第一二七期，一九九八年。

主角之一。他在北大時期遭遇的思想，交接的人物，幾乎已經展開了他那個時代所有的歷史脈絡，也埋下了他人生中所有的事業走向。他所生長的時代，是中國有史以來變動最劇烈的時代，羅氏以一位站在時代巨流前端意氣風發的青年，盡情發展其個性、才華、品格、識見和追求。其女久芳於一段追念父親的文字中道出那個時代包括羅家倫在內一千現代人物的生命意蘊：「父親一生的歷程中，中國遭受到歷史上空前的變遷與浩劫。在這不平凡的時代裡，產生了許多不太平凡的人物，父親就是這些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為他有獨特異人的個性和卓越超絕的人格。」¹

北京大學

羅家倫用史家的態度對北京大學的歷史變遷有過仔細的梳理和總結。「一個大學的精神，可以說是它的學風，也可以說是它在特殊的表現中所凝成的風格。這種風格的凝成不是突如其來的，更不是憑空想像的。它造就的因素，第一是它本身歷史的演進，第二是它教職員學生組合的成分，第三是它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實施。這三項各有不同，但互為因果，以致不能嚴格劃分。即以北京大學的精神而論，又安能獨為例外。」²對於北京大學的淵源所自，他說：

我們不願意攀附以前歷代首都的太學、國學；但是在首都要建立一座類似近代的大學，則自以

1 羅久芳：《追念我的父親》，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2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三一—一三二頁。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創立京師大學堂的詔書開始。而其內部的建置，主體是仕學院，收翰林院編修、檢討、六部中進士舉人出身的員司和都察院的御史等等做學生，並把官書局和譯書局並入。這是最初時期的第一階段。中經庚子之變而停辦，到一九〇一年才恢復。嗣後把同文學併入，以嚴復為譯書局總辦。次年取消仕學院而分設仕學館和師範館，並設英、法、俄、德、日五國語文專科，此係譯學院的前身。這是最初時期的第二階段。一九〇二年七月張之洞等會奏《重訂學堂章程》以後，大學中分為八科，上設通儒院（即現在大學研究院），下設預科，附設進士館、譯學館和醫學實業館。畢業後，分授科舉時代進士的頭銜，並將成績優異的進而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這是最初時期的三階段。綜觀這最初時期的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看出京師大學堂的幾種特點：

第一，承受當時維新圖強的潮流，想要把中西學術熔合在一爐；吳汝綸、嚴復諸先生同在一校擔任重要教職，就是象徵。但是舊學的勢力當然比新的深厚。第二，是要把「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此實行。當時學生半途出家的情形，演出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如上課時，學生的聽差，進房屈一膝打躬，口稱「請大人上課」。除譯學館學生較洋化而外，仕學館和以後的進士館則官氣彌漫。第三，因為學生的學識和資歷均高，所以養成了師弟之間，互相討論、坐而論道的風氣。這點對後來卻留下了很好的影響。¹

對於第三點，羅家倫還插入了一段趣事：「在清季象山陳漢章（字伯弢）先生是名舉人，以博

1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三二——一三三頁。

學聞於當世，於是京師大學堂請他來當教習。他到校後見一時人才之盛，又因為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可以得翰林（當時科舉已廢），於是他決定不就教習而做學生，在馬神廟四公主府梳妝樓上的大學藏書樓裡，苦苦用功六年，等到臨畢業可以得到翰林的一年，忽然革命了，他的翰林沒有得到，可是他的學問大進，成為樸學的權威。」¹

儘管可以這麼客觀評價京師大學堂的歷史，但當時校內氣氛仍相當陳腐。羅家倫有對他進入北京大學時及之前情形的記述：「北京大學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最初是京師大學堂，裡面分進士館、史學館、醫學館等，無一館的學生不是官氣十足的。據最初一班的人說：差不多一個學生要用一個聽差，上課的時候，有聽差來通知『老爺上課了！』於是這些學生老爺，才由鴉片床上爬起來，睡眼朦朧地帶著一個聽差到課堂去。醫學館比較多些洋氣，但是和進士館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別而已。」²「蔡到北大的一年，適巧是我去進北大的一年，當時的情形，可是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了。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識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窯子各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窯子裡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³這般陳腐可厭的情形，到蔡元培出掌北大，才風氣丕變，北京大學一躍成為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的時代標杆。

一九一一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特別請學通中西的嚴復為大學堂總監督，不久改為國立北京

1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三三頁。

2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大學，仍以嚴復繼續擔任。如此，正是著重於融會中國文化與西洋學術的傳統精神。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自己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就職的第一天，發表演說，主張學生進大學不當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大學學生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本其在教育總長時代的主張，認為任何挽救時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為中堅。羅家倫說：「這種精闢、勇敢、誠摯而富於感動性的呼聲，震開了當年北京八表同昏的烏煙瘴氣，不但給北京大學一個靈魂，而且給全國青年一個新啟示。」¹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如是陳述他的大學理念：「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以形容之。」²他在北京大學的就職演說中，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希望學生摒棄升官發財思想，抱定宗旨，以求學為目的。並且勉勵學生「砥礪德行」、「束身自愛」。在這樣的辦學理念下，蔡元培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當時的北大学生顧頡剛回憶：「蔡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他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麼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鑑別和選擇。五四運動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經發生過一次有名的公開辯論，轟動了全國。林寫信給蔡，攻擊蔡主辦北京大學以來『覆孔孟，鑄倫常』，『盡廢古書，引用土語為文學』。蔡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寫了一封公開信答覆

1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三四頁。

2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二二二頁。

林琴南，闡明瞭自己的辦學方針：『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¹在蔡先生這種辦學方針指引下，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蔡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像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都來到北大教書。²

蔡元培審時度勢，擴充文科和理科，停辦工科和商科，突出北大在「高深學問」而不是一應用研究」上的實力。蔡元培延聘大批學有專長的教授，解雇了若干濫竽充數的中國教員和外籍教員。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回憶說：「當時蔡初去時，本科分為四科，有四個學長，蔡接事後，重聘四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璠、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並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後，併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併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反對，只是教員也很不高興。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則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

1 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見北京大學檔案館網站 www.dag.bnu.edu.cn，「名人檔案」

2 參見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

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後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擔任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裡面教英文，蔡到以後，一氣把他們辭退了，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干涉，而蔡不為之動……」，在蔡元培如此魄力下大刀闊斧改革後的北大，真是極一時之盛，其校內兼容並包的情形也實在有趣之至。「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我方才說過，文科的人物，很有趣味，因為蔡對於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並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他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於主張激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並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可笑極了，蔡先生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可笑得很）。」²羅家倫所舉這一個極端的例子很能說明蔡元培兼容並包之澈底。羅家倫回憶當時學校裡新舊對峙，而各種性格鮮明的人物雜處一校的情形，實在是中國之前不曾有過，之後也復難及的盛況。新舊之間的矛盾固然大到無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思想的砥礪和爭鬥，無疑產生了無窮的活力，尤其是在學生的思想成長中。「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新派中包括了當時文學革命的各位主將，如陳獨秀、胡適、錢玄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2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周作人、魯迅等。」至於舊派方面，劉師培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於此類問題不去計較。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裡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於錢玄同，開口便是說玄同是什麼東西，他那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於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裡有痛快的事，金聖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後遂成為國故派。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並太息痛恨於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的時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的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了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那知道他在當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間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現在，他到祠堂裡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注疏》中三禮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後一大蓬黑胡子變成白胡子了。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問他中國的彈詞起於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兒再告訴你。我問他是上午九時，到十一時，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寫了二十七條都是關於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還有朱希祖、馬敘倫等，則遊移於新舊之間，講不到什麼立場的。從新青年出來以後，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後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

刺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北大當時的師資是這種情況，學生間也不例外，茲舉羅家倫所述一例可用：「那時候學生物質的生活非常樸素簡單，可是同學間的學術興趣，卻是配合成一幅光怪陸離的圖案。我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孟真住在校內的西齋四號。我早晨到校上課之前，首先要到他房裡談天，他沒有起來的時候，我有時候掀他棉被，他頗引以為苦，氣得大叫。他房間裡住了四個同學，一個顧頡剛，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一個狄君武（當時名福鼎），專心研究他的詞章，有時唱唱昆曲；一個周烈亞，阿彌陀佛地在研究他的佛經（後來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個就是大氣磅礴的傅孟真，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羅志希等，在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這是一個什麼配合！可是道並行不相悖，大家還是好朋友。」²

今天許多人都認為蔡元培入主北大，直接導致新派人物在北大得勢。但就當時情形來說，最令人驚嘆的是北大兼容並包，新舊並存一校的事實。更確切地說，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的確是囊括大典，網羅各家，恰好不是以派別論，而不拘派別，只是「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至於新文化運動成為今天看過去的北大底色，首先可以說蔡元培兼容並包的確得到新派人物獲得機會進入北大的客觀結果，但新舊相爭而新之勝出則毋寧說是時勢所造。如此，北大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五頁。

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支持下，北大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無論在教師還是學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產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如中文系裡的「國故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那以後，學生們打麻將、吃花酒的越來越少，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越來越多。¹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正如羅家倫所說：「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子民時代的北京大學。」²正如陳平原所言：由一個思想自由而嚴肅的講場，進而成為那個時代道義擔當的先鋒，「沒有比李大釗所書聯語『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能代表五四時期北大師生的情懷。這一兼及『高深學問』與『社會責任』的自我期許，日後成為無數北大人的夢想。」³這種由大學進而影響社會的理想，一定深深滲透在當年作為學生的羅家倫思想中，這於他將來執掌幾所大學影響至大。

師友往還

一九一七年，羅家倫二十一歲，負笈北上，入國立北京大學文科，正式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適逢蔡元培主持下那個黃金時代的北大，對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來說真是如魚得水。

1 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

2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3 陳平原：《我看北大百年變革》，《南方周末》，二〇〇三年七月十日。

羅家倫在北大主修外國文學，但他和當時好友傅斯年等一干人都有些貪多務得的毛病，興趣極為廣泛，選課很多。羅是新潮派人物，但他也常聽幾位守舊派大師的課。他回憶當時去上辜鴻銘講英國詩歌的課，辜之頑固守舊的態度貫注在他對英國詩的說法裡，大為有趣。辜竟把英國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甚至還有「洋離騷」哩！羅家倫還寫到有一次他把辜鴻銘氣壞了。當時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辜鴻銘在一個日本人辦的《華北正報》裡寫了一篇文章，大罵學生運動，說學生是暴徒、是野蠻。羅家倫看報之後受不住了，把報紙帶進教室，質問辜道：「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這一下把辜氣得臉色發青，很大的眼睛突出來了，一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著講臺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羅家倫自述當年師友間交往過從，很能見出北大風氣之一斑：「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比較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喜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見面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丸善株式會社去定買外國書。除了早晚在宿舍裡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

1 參見羅家倫：《回憶辜鴻銘先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一四六—一四七頁。

李大釗的房子），這是一個另外的聚合場所。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所以當時大家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群君終日言不及義，是他批評南方人的話。）這兩個房子裡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之資料。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於天天在那裡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兩個人，因為我們的新潮社和飽無堂只隔著兩個房間。當時學生界的思想也有一個劇烈的變動。最初的北大學生看外國書的很少，到了我們的時候，看外國書的便比較多起來了。傅孟真和我兩個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報效一點款子。傅孟真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柢，尤其是於六朝時代的文學，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詩，後來罵李義山是妖，我說：「當你自己也高興著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顧頡剛。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間裡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還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

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唧唧唔唔在做中國小品文字，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成），他也無可奈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見北大當時各種分子雜居一處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種學術自由的空氣。」¹

從羅家倫以及其他人的回憶中，都就可以看到當時北大那種極為難得的校園氛圍，充滿了生機與活力。這種生機與活力，當然有部分源自新文化運動的朝氣，但也來自兼容並包，新舊並存的切磋、砥礪。這番北大黃金時代的景象，已成為中國現代大學之道的一種理想型。

在北大的教授當中，羅家倫最常接觸和接近的是胡適和李大釗。和胡適接近多是文學革命的事情，和李大釗的接觸，則因李熱心支持新潮社，所以聯繫很多。對於蔣夢麟，羅家倫也很尊敬。但他們也有過辯難和爭論。同學之中，和羅家倫最要好的，首推傅斯年，然後是段錫朋（書詒）、楊振聲（金甫）、狄福鼎（君武）、吳康（敬軒）等。

羅家倫在多年後的紀念文章中這樣寫道：「在朋友之中，我與傅孟真最親切，可是傅孟真最佩服的是段書詒。孟真是對的。」²段錫朋的識見和品質很得羅志希、傅孟真他們這一班朋友的器重和感佩。段錫朋逝後，羅家倫有絕句一首寫他對段錫朋的認識：「亦墨亦儒亦真誠，遠識高標兩絕倫；憂患不容余涕淚，我今痛哭為蒼生。」³段錫朋先是商科學生，後來蔡元培改革，將商科改為法科，段錫朋也就成了法科學生。一九一八年羅家倫和段錫朋在北大結識，當時羅家倫和傅斯年等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2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二頁。

3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五頁。

在創辦《新潮》，為新文化運動呼喊；而段錫朋則政治色彩更濃厚，傾向國家主義的《國民雜誌》接近。不過，正如羅家倫所言：「最初國民雜誌裡的朋友們對於新文化運動觀念是帶有一點保守性的，認為我們新文化運動的主張不免過於激烈。可是大家對於反軍閥、反侵略，要澄清政治，復興民族的主張是一樣的，所以大家並不站在反對的立場。」¹一九一八年，為了反對媚日外交，出賣高徐、濟順兩條鐵路的事件，北大學生在西齋飯廳開會，並歡迎留日回國學生報告日本侵略中國的企圖。當天羅家倫是最後一個演講的人，情緒激昂之下，遂提議發起第二天北大全體學生赴新華門請願和抗議的運動。這件事弄到蔡元培一度辭職，羅家倫也受到一部分同學的責難。不過段錫朋當時頗給予羅家倫支持和安慰。段錫朋對蔡校長是非常崇敬和愛戴的，但他對羅家倫說：「像漢宋太學生陳蕃、李膺、陳京這般人的風骨，是我們大家所需要的。」²這句話，羅家倫在紀念段錫朋的文中提及，以表現段錫朋心中所保存的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至於羅家倫和段錫朋成為至交好友，則是因為五四運動中的經歷。羅家倫晚年仍保留著非常生動的記憶：「其實在五三的晚上和五四的那天，書詒雖然參加，卻不是主動的分子。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擴大，情勢非常嚴重，眾議不免紛紜的時候，書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熱忱的姿態，突現於全體北大同學和整個北京專科以上學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藍舊布長衫，可是他的言論，他的主張，他的氣概，他發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領導者。有一次，北大全體罷課了，他認為不當，

1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六頁。

2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六頁。

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社堂召集大會，單人演講了一點多鐘，使大家立刻復課。北洋軍閥很注意他，他的安全自然發生問題，他仍然是穿那一件藍布舊衫，照常活動，有時加戴一副黑眼鏡。事後談起來，頗覺可笑。同學們對他由信任而愛護，為了要對抗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段祈瑞起見，大家叫他做『我們的段總理』，以後為簡單化，乾脆叫他『段總理』。他後來被推到上海，遂由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被推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擴大了『五四』的號召，實現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親日巨魁的罷免，最後並阻止了《巴黎和約》的簽字，才保留山東問題在華盛頓會議席上得到有利的解決，把青島膠州灣和膠濟鐵路的領土主權次第收回。尤其重要的是藉『五四』運動而震醒了當時及以後青年們的國家民族意識，兼使新文化運動得以推廣。」¹

在「五四」那一段，羅家倫和段錫朋幾乎天天在一起。有幾次工作到夜深了，還擠在一張窄小的硬木床上睡覺，一談談到天亮。當年段書詒在談話的時候，常常要提到「廬陵歐陽公的文章道德」。羅家倫有幾回聽膩了，忍不住搶白他道：「你的廬陵歐陽公的文章道德又來了。」話雖這樣說，可是羅家倫知道段錫朋真相信這一套，所以羅家倫一直強調段錫朋的道德觀點是儒家的，他身上有中國傳統士人的風骨。段羅兩人後來同是穆藕初獎學金出國的學生。段回國後參加國民革命、從事國民黨黨政教育、走上仕途等等，和羅家倫的生涯最為接近。羅家倫這樣寫道：「他回國以前，和我談天，總是主張他自己要多教幾年書才從事政治社會工作。他在北京和廣州也曾這樣試過。可是他為國家民族的熱忱，配合上國民革命的主潮，如何能使他安靜呢？他在廣州積極投身國民革命工

1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六—六七頁。

作了。他加入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從廣州到南昌，經過了一段有生命危險的苦鬥，尤其最後在南昌的一個階段，屢次幾遭不測。北伐成功以後，他認為教育和訓練，還是整飭革命部隊的基本，所以便加入中央黨校（後來演變為中央政校），任教約有兩年，以後加入教育部和主持中央訓練委員會……」，這樣一段話，何嘗不是羅家倫本人相似經歷的一個寫照呢。大概正因為這些相似的抱負，羅家倫對段錫朋有著非常深切的感佩和認識。而羅家倫給朋輩寫的紀念文章中似乎也以對傅孟真和段書詒的最為生動活潑而又真摯感人：「書詒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才，許多友朋不但佩服他，而且服他。他不好多說話，可是對朋友們開起玩笑來，他最頑皮，有時會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樣，他有時來上一兩句諷刺話，弄得我們啼笑皆非，可是話中卻有真理，使人無法反攻，所以在談話場合中最好恃強拒捕的傅孟真，遇著他也毫無辦法。從這些玩笑裡，常可以看見書詒的風趣，書詒決非枯燥無味的人，而且是平易近人的人，朋友們服他，不只因為他的遠見卓識，而且因為他的真摯熱忱，何況他有高超絕俗的人格，有這種偉大人格的人，是不會對不起事，對不住人的！」他接著說：「『書詒是天下才』這句話本來是孟真說的。三年前，孟真在南京時來看我，慨然嘆道：『書詒是天下才，而始終不能一展他的抱負，使我有「才大難為用」之感。其實抱這種嘆息的豈只孟真一人……』」²

楊振聲是「新潮」初創時期的編輯部的書記，羅家倫的助手，他的山東人脾氣和羅家倫很相投，

1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六九—七〇頁。

2 羅家倫：《書詒天下才，我為蒼生哭》，《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二頁。

後來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時，就把在北大的楊振聲挖到他的參謀總部去，接著做他的得力助手。狄福鼎當時在北大哲學系，和羅家倫相識於北大西齋四號房間，這個房間住著傅斯年、顧頡剛、狄福鼎和周烈亞四人，也成了他們一班朋友常常聚集討論之地。羅家倫回憶說：「狄君武先生與我相識遠在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學西齋四號房間。這號房間裡共住四人，為傅孟真、顧頡剛、周烈亞、狄君武。我因為同孟真、頡剛都對文學革命運動有很大的興趣，故常到四號商討編撰和出版《新潮》問題。君武此時雖在哲學系，卻愛好『選舉』，常常填詞作曲以就正於黃季剛、吳瞿安兩先生。烈亞則治佛學，後來做西湖某大叢林的住持。『道並行而不相悖』，正是當時的氣氛。」¹「到了『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波濤洶湧，君武見外患日迫，軍閥專橫，於是一變其文人積習，而投身於此一運動。如營救五四到六三間陸續被捕之同學一幕，他和我在晚間帶了些食品 and 內衣等到警察廳內的看守所『探監』。一進廳門，衛兵均以刺刀相向。我要和他一道進去，他力阻我同去。他說：『他們認得你，不認得我。』又說：『你會同他們爭執，讓我單獨去罷！』我不肯，終於同進去。他以和善口吻，說太倉人學講的北京話，對方看他是一個十足的文弱書生，態度也就和緩下來了。這是他在『秀才遇到兵』的場合中，能應變的一幕。以後幾次類似的交涉，同學們都推他去辦。」²關於狄，還有一事見於羅家倫關於五四運動的回憶中：「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離危險期，時時有死毫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間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

1 羅家倫：《狄君武先生遺稿·前言》，《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二〇三頁。

2 羅家倫：《狄君武先生遺稿·前言》，《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二〇三—二〇四頁。

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吳康也是學哲學的，他和羅家倫當時是「杜威講壇」的熱心人。一九一九年實驗主義大師杜威來華作長期講學，由胡適親自安排，接待，並主持介紹及口譯等工作。杜威在北大進行一系列演說時，學術界掀起了一陣空前的熱潮。羅家倫和吳康兩個學生被選派負責筆錄講詞，經胡適整理核對後，再由《新潮》開闢「杜威講壇」發表。這幾個人都是羅家倫生前常常提起的益友。

蔡師楷模

對北大的師長，羅家倫最崇拜的就是蔡元培。他以「偉大」和「崇高」來形容蔡元培的人格。從羅一生的抱負、行狀而言，也可見出蔡元培的至深影響。從蔡元培身上看到那種教育救國的信念深刻影響了包括羅家倫在內的一代人。羅家倫曾記下這麼一件事：「蔡先生在青年時期，才華煥發，於二十六歲點翰林，更是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戊戌政變時，楊銳等主持變法運動者曾極力拉攏蔡先生，他拒絕了，可是他的同榜翰林張菊生先生被拉去了。（這正是蔡先生與張先生進退不同之處。）我有一次請問蔡先生當時為什麼拒絕維新派的邀請，先生從容地對我說：『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

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我並且覺得他們的態度也未免太輕率。聽說有幾位年輕氣盛的新貴們在辦公室裡彼此通條子時，不寫西太后，而稱「老淫婦」，這種態度，我認為不足以當大事，還是回家鄉去辦學堂罷。」這一段話，我至今覺得「言猶在耳」，不能不趁這當口寫下來。這就是蔡先生終身從事於教育文化大業的開始。」¹羅家倫後來從事的一系列教育事業都可目為這一代人前後相繼的事業。對蔡元培於北京大學及當時學術界的深遠影響，對於蔡元培的思想和態度，羅家倫做過這樣的評價，從中亦可看出他本人後來從事教育事業時從蔡元培承繼下來的種種理想：

第一，他是一位中國學問很深、民族意識極強、於中年以後再到歐洲留學多年的人，所以他對於中西文化，取融會貫通的態度。他提倡新的科學研究，但當時他為北京大學集合的國學大師，實極一時之盛。他對於雙方文化的內涵，是主張首先經過選擇而後加以保留或吸收。

第二，他研究哲學而又受希臘美術精神的影響很深，所以主張發展人生的修養，尤其當以美育來涵養性靈；以優美代替粗俗，化殘暴而為慈祥。

第三，他在法國的時候，受到兩種思想的感應：一種是啟明時代一般思想家對文藝和科學的態度，以後他並贊成孔德（A. Comte）的實證主義；一種是法國大革命時代「自由、平等、博愛」的號召，所以他主張民主。

第四，他對於大學的觀念，深深無疑義的是受了十九世紀初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Wilhelm

¹ 羅家倫：《從蔡子民先生致吳稚暉先生函看辛亥武昌起義時留歐革命黨人動態》，《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Von Humboldt) 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大學者的影響「英國著名史學家谷趣 (G. P. Gooch) 稱，當時柏林大學的建立，是十九世紀一件大事」。蔡先生和他一樣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藉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但不主張，而且反對。有如馬克思的思想，他以為在大學裡是可以研究的。不過在「五四」時代，北京大學並未開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課程。經學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劉師培先生，為一代大師，而劉教的是三禮、尚書和訓詁，絕未講過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鴻銘先生，是老復辟派，他教的是英詩（他把英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我在教室裡想笑而不敢笑，卻是十分欣賞），也從來不曾講過一聲復辟。

第五，他認為大學的學術基礎，應當建立在文哲和純粹的自然科學上面。在學術史上，許多學術思想的大運動、大貢獻，常是發源於文理學院研究的對象和結果裡。所以大學從學術貢獻的基礎來看，應以文理學院為重心。其他學院可在大學設置，但不設文理兩院者，不得稱大學。這個見解裡面，確是含有了解學術思想全景及其進化的眼光。

第六，他是主張學術界的互助與合作，而極端反對妒忌和排擠的。他提倡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互助論。他認為學術的研究，要有集體的合作；就是校與校之間，也應當有互助與合作，一個學校不必包攬一切。所以他曾經把北京大學的工學院，送給北洋大學。

第七，根據同樣的理由，他極力反對學校內或校際間有派系。他認為只能有學說的宗師，不能有門戶的領袖。他認為「泱泱大風」、「休休有容」，為民族發揚學術文化的光輝，才是大學應有的風度。

第八，他幼年服膺明季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對於宋明理學的修養很深，所以他律己嚴而待人寬。他有內心的剛強，同時有溫良恭儉讓的美德，所以他能實行「身教」，不但許多學生，而且有許多教授，「中心悅而誠服」。¹

作為當時北大學生中的佼佼者之一，羅家倫當時自然也頗受蔡元培的重視和提拔。羅家倫在北大期間是一名相當活躍的學生。一九二七年北大首創用學生主持「教授會」，四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和康白情分別擔任四個學院的「主任」。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夜，在北大學生千人大會決定第二天遊行示威之後，校長蔡元培急召五個學生領袖開會作籌劃，這緊要關頭的「五大領袖」是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段錫朋、康白情。一九二〇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紛紛出國。蔡元培向南洋煙草公司募來款項，親自選出這屆北大畢業生中幾個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學。段錫朋、汪敬熙、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五人出國一事，被報刊比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出洋」。

對於蔡元培的性情、人格和風範，羅家倫多有敬仰讚美之辭。他寫過多篇紀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他說：「蔡先生是許多位朋友同學們和我一般心悅誠服的先生，他是學貫中西的淳儒和通儒，更是具備『溫良恭儉讓』各項美德的君子。人家看見他『休休有容』，反誤認他是『好好先生』，殊不知他『外柔內剛』，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風格。因為他雖然對於欺騙或利用他的人的來意

1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三四—一三五頁。

早已洞若觀火，但是不願意當面予人以難堪，這正是他的恕道，可是被行險僥幸的小人反認為『君子可欺以其方』。其實他何曾像人家所稱讚的宋朝名相呂端一般，只是『大事不可糊塗』而已，他對於國家大事小事，豈但是消極的不糊塗，正自有其極敏銳而深刻的先見和遠見。』¹在蔡元培逝後的哀辭中羅家倫形容蔡「如大海容納眾流，不厭涓滴，是先生的包容。汪汪若萬頃之波，一片清光，遠接天際，是先生的風度。慈祥愷悌，謙光中流露至誠，是先生對人的感化。『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是先生的風骨。』²蔡元培對於羅家倫的影響，見諸羅一生的事業、作為。所以他說：「先生感召的力量是無形的，因其無形，所以格外偉大。」³

羅家倫善寫簡短而鏗鏘有力的文字，他這篇紀念蔡元培的文字，簡短而富有感染力，值得錄下：

〈偉大與崇高——紀念先師蔡子民先生〉

當著國家動蕩的時候，全民族失了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這種損失，哪裡是當代的人所能測度。

偉大的蔡先生居然在這時候離開我們了！悲傷的豈只是他的門生、他的故舊。他門生故舊的悲傷，又豈只是他們的私慟。

凝結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英，採擷西洋文化的優美，聯合哲學美學科學於一生，使先生的事業，

1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的風格和遠見》，《歷史的先見——羅家倫文化隨筆》，第一四三—一四四頁。

2 羅家倫：《偉大與崇高——紀念先師蔡子民先生》，《文存》第十冊，記傳。

3 羅家倫：《偉大與崇高——紀念先師蔡子民先生》，《文存》第十冊，記傳。

不特繼往，而且開來。

先生永遠是站在時代前面的偉大人物。

先生不但是偉大人物，而且是偉大人格！

如大海容納眾流，不厭涓滴，是先生的包容。

汪汪若萬頃之波，一片清光，遠接天際，是先生的風度。

慈祥愷悌，謙光中流露至誠，是先生對人的感化。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是先生的風骨。

常見先生書房中掛了一幅自己的畫像，上面題著：「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不知老之將至。」這是先生持身處世的精神。

又常見先生的書桌邊有自己寫的「學不厭，教不倦」六個字的橫幀。這是先生治學教人的態度。

更有一次我求先生寫幾個字，先生寫了「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這是先生的人類社會觀。

先生感召的力量是無形的，因其無形，所以格外偉大。

對於這一代大師的言行，何從記起；在悲哀情緒之中，更從何處想記。大家只看見先生謙沖和藹的方面，而少知道先生堅毅不拔、風骨峻峭的方面，所以我寫下幾段短的故事。

在「五四」運動以後，北洋軍閥橫施壓迫的時候，先生處於危難艱苦之中，突然發表一篇不過二百字左右、卻是光芒萬丈的短文，叫做《洪水與猛獸》，主張疏導新思潮的洪水，而馴伏北洋軍閥的猛獸。

一九二一年，先生遊歷美國，到綺色佳，我和幾位同學接先生到一個寓所休息；忽然聽見一位美國新放的駐華公使要招待先生，想請先生介紹於北方權貴；先生坐猶未定，堅決地立刻要離開。我們勸先生多休息一會也不可得，結果立刻去遊覽附近幾十里的一個瀑布。

在「七七」抗戰前兩年，先生到南京，那時候汪精衛還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這後來變作漢奸的汪精衛請先生晚餐，進的是西膳。先生苦勸他改變親日的行為，立定嚴正態度，以推進抗戰的國策。在座的都看見先生的眼淚，滴在湯盤裡，和湯一道咽下去。

先生有不為而後有為的精神，哪裡是一般人所可想像。先生太崇高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千百年後，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渴望的境界。

不才的門生像我，每逢艱難挫折的時候，一閉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懸在胸際。想到先生臨危受困時的雍容肅穆，七十幾年的努力不懈，什麼暴躁不平之氣，都該平下去了。

先生給後輩的德化，有如長江之流，永遠不會枯竭！

先生的軀殼死了，先生的精神，無窮的廣則彌漫在文化的宇宙間，深則憩息在人們的內心深處！

羅氏此文寫於一九四〇年，此時他已經四十四歲，已經執掌過清華大學，在中央大學任上也已經九年之久，為抗戰中的中央大學苦苦支撐，心力交瘁。當他寫：「不才的門生像我，每逢艱難挫折的時候，一閉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懸在胸際。想到先生臨危受困的雍容肅穆，

七十幾年的努力不懈，什麼暴躁不平之氣，都該平下去了。」蔡元培的確化成了羅氏生命中極為重要的精神力量，在他一生的事業中持續不斷地激勵著他。

良師胡適

胡適回國到北大任教和羅家倫考入北大正好是同一年，即一九一七年秋季。而此時的胡適不過是比他的學生們年長幾歲而已，面對像傅斯年、顧頡剛這一類優異的學生，刚开始，學生固然對老師頗有疑慮，老師對學生也果有怯意。但胡適所用一套全新的方法，給北大這些聰穎的學生帶來了新潮。顧頡剛的回憶中記述了他們當時所受的震動：「他（胡適）又年輕，那時才二十七歲，許多同學都瞧不起他，我瞧他略去了從遠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勝其煩的一段，只從《詩經》裡取材，稱西周為『詩人時代』，有截斷眾流的魄力，就對傅斯年說了。傅斯年本是『中國文學系』的學生，黃侃教授的高足，而黃侃則是北大裡有力的守舊派，一向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話文而引起他的痛罵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¹胡適在回國以前，已經寫過一篇《文學改良芻議》而進入了新舊文學論戰。此時正當蔡元培在北大實行「兼容全包」政策，鼓勵學生培養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研究學術的時候，這位與許多學生年齡相差無幾，卻帶來了西方文化和學術界最新訊息的教授，立即吸引了大批學生的

1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上），《中國哲學》第二輯（一九八〇年三月），第三三二頁。轉引自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胡適》，《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五年版，第一五三頁。

注意。他的課室、辦公室和住所，都成了眾人聚集的地方。羅家倫主修的是外國文學，必定選過胡適所開的英文課；羅家倫又愛選聽外系的課，其中有學分的六門（三門是兩學期的課）便在胡適所屬的哲學系。羅家倫回憶最初與傅斯年結交，先是在哲學系同上過三門課，而他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之先生家裡。那時他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此地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中國文學系的傅斯年、中國哲學系的顧頡剛、數學系的毛子水和外文系的羅家倫，都是最早在這種環境中受教於胡適的學生，因而終生尊他為「先生」。

胡適對上述這一千人等的影響極為深遠。如此年輕的師長，比他這些學生大不了幾歲且本來又是謙和平易的人，他們之間的關係的確亦師亦友。甚至一開始，胡適謙抑，而學生狂妄起來的時候多有之。在羅久芳文中，從胡適留存的書信可看出羅家倫和傅斯年一千學生對教授的直言不諱：「今天《時事新報》上又有那上海式的鴛鴦蝴蝶先生與你談詩；同人的意思，請先生不理；若是先生理他，便是中了他的計。因為他們這班無聊的人，求先生理不得，先生理他就是同他登廣告。學生家倫。十九日。」另一封是傅斯年和羅家倫的聯名信，為的是《新青年》內部意見分歧，面臨停辦，而胡適有可能接手，於是敦勸他「斬釘截鐵，一定不辦」。信讀來有趣，雖稱之為先生，但語氣卻著實不客氣地在「指教」。或許因為胡適一向溫和的性情，這些年輕氣盛的學生常常覺得要在某些立場問題上替他拿主意。在往後的崢嶸歲月，他們之間起了爭議，往往不類師生而似平輩，亦常

1 參見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2 參見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有之。胡適的這些學生中將來多有涉足政壇，效力於民國政府的，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而胡適則始終和國民黨保持著一種「諍友」的關係，這使得他同這些學生間的關係亦變得微妙，大概那時候，學生們才特別深切地領會到這個溫和先生內裡的剛正。終其一生，胡適以其交往中富有人性而原則上充滿勇氣和道義的人格力量使這些常常跟他直言爭辯的弟子們折服，其精神亦多少感染和貫注到他們當中。羅家倫在一首記胡適的詩中寫下這樣一樣：

你永遠說你心上要說的話，
可是你永不給人家煩惱；
因為你任何的批評，
裡面帶著無限的同情。
人家說你「和易近人」，
可是在正義和主張上
你卻能和人爭。¹

這段話多年後還有人引為概括「胡適精神」的精彩之句。

對於羅家倫來說，他一生中同胡適的關係並非最密，但無不在其生涯的各個階段中留下顯著的

1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二〇〇三年第六期。

印記。進入北大是他們師生關係的開始，然後自然就是新文化運動，辦《新潮》，五四運動，羅留學歸來後他們都開始介入民國的政治生活，以後則多因此而交接，也有過衝突，但更多的是共同的奮爭、支持和努力。羅家倫後來成為民國政府駐印度大使一節，並胡適出任駐美國大使，則是民國時候學者大使僅有的兩例，胡適也堪稱這種學者大使的楷模。最初的那段歲月中，正如羅久芳指出：「一九一七——一九二〇這三年中，北大校內是一塊肥沃的學術土地，人才濟濟，百家爭鳴；而國內和國際的局勢，卻是充滿了黑暗和危機，事故橫生，師生間的互動也格外熱絡。這時期胡適對羅家倫的影響，在課室內外同時進展，但課外實際經歷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¹

在新文化運動方面，羅家倫無疑是胡適最忠實熱烈的追隨者、支持者之一，北大時期自是他們因新文化運動而關係最密的時期。而後來，在羅家倫介入國民黨政黨政治，在政治立場上胡適與其保持一定距離，但在新文化運動的理念和行動上羅家倫仍與胡適保持一致，終羅氏一生，堪稱胡適新文化運動忠實堅定的同道。北大時期，在一系列的工作中，羅家倫幾乎成了胡適「助手」，無論在思想觀念和學術追求上，羅家倫都非常明顯地受到胡適的影響，正是在胡適的榜樣下展開自己所要從事事業的諸多方向。根據羅久芳女士的《胡適與羅家倫》一文，可總結如下：

首先是在文學革命方面。一九一八年胡適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後，新舊兩派的論戰在北大校園內日趨激烈。羅家倫當時對胡適提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特別推崇，堅決捍衛。他本喜讀外國文學的書，這方面有不錯的基礎，成為胡適文學革命思想方面的得力支持者。從《新潮》中

1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羅家倫響應文學革命的第一炮《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到發表在同年《新青年》第五期的第二篇，將近兩萬字的《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再到發表在十二月的《新潮》上，一九二〇年羅家倫在赴美留學的船上完成的另一篇長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都一一展現了羅家倫對胡適文學革命論的響應。

在白話文運動上，羅家倫也是胡適的最早最堅定的支持者。一九一八年以前一般的報紙絕大多數採用文言。《新青年》中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九一七／七）和羅家倫的《青年學生》（一九一八／六）也都不在例外。但是那年四月胡適發表的《建設的中國革命論》，便改用了白話；所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贏得了青年讀者熱烈的響應。同年，胡適編輯「易卜生專號」，選擇的兩個劇本之一《A Doll's House》（中劇名《娜拉》），是由羅家倫譯第一、二幕，胡適自己已完成第三幕；用的自然是上口的國語。師生的合作，立即產生了廣泛的效應。經過了這次試驗，羅家倫對翻譯的興趣大增。在北大期間他為《晨報》和《東方雜誌》譯過六篇專文和兩本書（節譯），並在畢業前約定為商務印書館翻譯 B. Bury: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和 Paul Reinsc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在他工讀求學期間，這項工作是他重要的經濟來源。羅氏對翻譯西洋詩與劇本的興趣，持續了十餘年之久。一九三一年曾出版了《近代英文獨幕劇》；一九三九年的《疾風》新詩集，則包括了不少早期譯出的英文及德文詩。¹

對於易卜生主義和婦女解放，羅家倫亦追隨胡適。胡適本人對此當然有著特別的體會和認識，

1 參見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而他所介紹的易卜生戲劇中的主題也立刻在年輕人中得到了極為熱烈的響應：「一九一八年胡適選擇《娜拉》這個劇本的目的，是在強調易卜生主義中的人格獨立精神，並介紹作者以寫實方法描述家庭及社會的實在情形。女主人公娜拉的訴求，卻在青年讀者中引起了特別強烈的反應，紛紛對於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和女性不平等的地位，展開了公開的討論。胡適連接發展的《貞操問題》、《美國的婦人》等文字，更產生了帶頭作用。」「一九一九年元月《新潮》創刊後，北大的徐彥之、康白情、顧頡剛等人，很快都對這些現象各抒己見。三月號裡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是一個富寓言性的故事，敘述一個男同學在婚姻與愛情上的痛苦遭遇，代表了當時許多青年男女的夢魘。接著他在五月十一日的《晨報》發表了《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強調唯有高等教育才能增高女子的知識、地位以及婚姻自由的程度。」「是年夏天美國哲學教授John Dewey（杜威）來北京講學，Alice夫人（女權運動者）、次女Lucy（歷史學家），以及Bryn Mawr學院教授Smith夫人各有一場公開演講，由胡適口譯，羅家倫記錄後發表。她們所介紹的美國各級教育的概況，更產生了啟發的作用。十月《新潮》刊出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目便叫《婦女解放》，是羅氏個人最系統的表述。他先列舉了一些歐美先進國家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就，接著便強調男女應當平等的理由，以及在中國實行的必要。他提出的幾個根本辦法，包括男女共同的教育、女子職業的發展和兒童的公育，並同時介紹了胡適所提倡的『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在討論發展婦女的職業和反對『貞操的迷信』時，他推崇胡適、徐俟、周作人幾位先生在《新青年》裡很精闢的文章。他主張女性應有獨立的人格，特別舉出《娜拉》劇中女主角的覺悟作為例證。在談到輔助婦女求職方面，他引用了Smith夫人演說中所介紹美國新特設的機構，並說：『聽過之後，胡適之先生同我談起，也認為

（設立此類機構）是極緊要極不可少的事。主張文學革命的師生，在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各個層面時，也加速了爭取中國女性權利地位之運動的發展」¹。

而杜威對於羅家倫的影響，更是因了胡適之緣故：一九一九年實驗主義大師杜威來華作長期講學，由他的弟子胡適親自安排、接待，並主持介紹及口譯等工作。在北大進行一系列演說時，學術界掀起了一陣空前的熱潮，研讀杜威原著在學生中也形成風尚。羅家倫和吳康兩個學生被選派負責筆錄講詞，經胡適整理核對後，再由《新潮》開闢「杜威講壇」發表。在杜威到達之前，胡適先安排了幾個學生公開演講介紹杜威的學說，他自己講的是《實驗主義》，文章在四月的《新青年》發表，詳細介紹杜威的中心思想及論著。八月羅家倫寫成了一篇《杜威博士的〈學校與社會〉》，介紹杜威「學校就是社會，教育就是生活」的基本觀念，以及著者根據新的心理學說所提出的教育理論，作為改善中國教育的參考。在第一期《新潮》（一九一九／十）中，羅家倫還發表了另一篇新書介紹：《杜威博士的〈德育原理〉》，文章內容與前不久親聆的演說《現代教育的趨勢》相印證，使讀者更能把握住杜威「道德教育」的精髓。一學年中，由羅、吳兩人記錄的演說分成「思想的派別」、「教育哲學」和「近代的三個哲學家」三個課題，共二十七篇。胡適先擬定了翻譯和記錄的程序，請杜威先「用他自身帶的打字機把大綱打好，交一份給翻譯的人，讓他能夠事先想好一些適當的中國詞句，以便到時翻譯。在北京演講的時候，那些演講大綱，總在每次講完以後，又交給那些作記錄的人。讓他們校對一番，再拿去發表。」這種嚴格的訓練，對任何一個大學生來說，

1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這個時期羅家倫還另開始翻譯杜威的《學校與社會》，並有繼續翻譯其他幾本杜氏著作的計劃，但都因為參與活動太多而放棄了。他到達美國讀到杜威的新書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後，寫了一篇長文《哲學改造》，將書中八章內的概念，逐一加以敘述，目的是介紹實驗主義哲學各方面的綱領。他認為此書不但能打破哲學神秘的觀念，並且能採用「歷史法」，來「引導人從抽象的到具體的，從普遍的到特殊的觀念上去」。對於「救中國思想界的危機，尤為緊要」。羅家倫在美國留學時，曾有兩年在紐約追隨杜威研習。一九五二年大師逝世，羅家倫有一段對記者的談話，他說：「杜威不止在學術思想上，予我們極大之益處，其人格之純潔、高尚、真誠、慈祥，對中國之誠摯的友誼，都給我們不可磨滅的印象。」並且說：「杜威在教育學術上之貢獻，乃是反對形式的教育；而主張自動自發，引申式的教育……在哲學方面，杜威是實驗主義 (Pragmatism) 之創始者；他與皮爾士 (Pierce)、哲姆士 (James) 同為三大創始人。這個哲學派別，乃以科學的方法，找出一個邏輯的系統，再從而建立其哲學系統。」羅氏一生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所堅持的科學精神和對學術自由的信念，可以追溯到大學時期的那一段課外活動。¹

至於他們辦《新潮》，那更是成為《新青年》之外鼓吹新文化運動的又一生力軍，也直接得到《新青年》諸人的支持，陳獨秀、李大釗很乾脆地給他們支持和幫助，胡適則應邀做了「顧問」。而《新潮》的宗旨，如羅家倫日後總結的：「我們不但主張，而且實行徹底的以近代人的語言，來表達近代人的意想，所以全部用語體文而不登載文言文。我們主張文學主要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

1 參見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應當著重從這個方面去使文學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們力持要發揚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與反人性的文學。我們主張學術思想的解放，打開以往傳統的束縛，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我們推廣這種主張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方面，而對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加以批評。我們甚至於主張當時最駭人聽聞的婦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濃，可是我們堅決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民族的獨立和自決。總而言之，我們深信時至今日，我們應當復位價值標準，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來把我們固有的文化，分別的重新估價。」這裡一一都可對應到陳獨秀、胡適諸人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主張的方方面面。

益友孟真

說起羅家倫的大學時代，說到《新潮》，羅家倫的名字常常和傅斯年連在一起。羅家倫在懷念傅斯年的文章中說：「這個人是我三十四年的生死道義之交，打不散，罵不開的朋友。」¹

傅斯年，字孟真，一八九六年出生在山東聊城一個累世官宦、書香傳家的家族。傅斯年自小就在家學影響下飽讀詩書，少時學完十三經，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傅斯年在天津開始接受新式教育，系統學習了物理、化學、數學等學科，並接觸大量新式書刊。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經過三年北大預科的訓練後升入文科本科國文門。傅斯年國學根底相當出眾，很受時在北大任教的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六頁。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三頁。

國學大師劉師培、黃侃等人器重。同時，傅斯年的英文也很不錯，在北大這個自由的天地中，慢慢開始接觸眾多新派人物。傅斯年先前是黃季剛的高足，但胡適的影響使得他慢慢傾向了「新」的派陣營。羅家倫回憶：「這時期還是適之先生發表了《改良文學芻議》以後，而尚未正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學革命主張作號召以前。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博與精，和他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後的創獲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適之先生於北大校慶之夕，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聚餐時演講，就公開有此謙詞。）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當時的真正國學大師如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幾位先生，也非常之讚賞孟真，抱著老儒傳經的觀念，想他繼承儀徵學統，或是太炎學派等衣鉢。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資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頭腦的孟真，絕不徘徊歧路，竟一躍而投身文學革命的陣營了。以後文學革命的旗幟，因得孟真而大張。」¹

對於傅斯年中國學問之好，羅家倫還講過一個小插曲：在當時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所教《文心雕龍》非其所長，於是出了好些錯誤。有一個同學借了朱教授的講義全稿給傅斯年，傅用一個晚上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給蔡元培校長，請求補救，書中附列了這三十幾條錯誤。蔡元培對那些問題也是內行，看了當即明白，但他擔心是教授之間相互攻訐，不相信完全是學生們自己發現的，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同學。這些學生也慌了神，怕校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四頁。

長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擔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在見校長之前，每人分任幾條，預備好了，才去見校長。校長果然當面考試，學生們答得頭頭是道，無懈可擊。之後，這門功課便做了調整。這件事可以表示一點當時的學風。羅家倫那年不曾選這樣功課，可是他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傅斯年他們退出來以後，各個大笑，他也幫了大笑。¹

羅家倫和傅斯年一九一七年在北平認識。羅家倫回憶：「我和孟真是民國六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認識的。他經過三年標準很高的北大預科的訓練以後，升入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國學問的基礎很好，而且瀏覽英文的能力很強。這是一件研究中國學問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條件。我是從上海直接考進文科本科的學生，當時讀的是外國文學，和他的中國文學雖然隔系，可是我們兩人在學問方面都有貪多務得的壞習慣，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選科，弄到同班的功課很多，就在哲學方面，也同過三樣功課的班。我們開始有較深的了解，卻在胡適之先生家裡。那時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²他們慢慢成為學問和思想的益友。到創辦《新潮》，他倆更成了親密的「戰友」。《新潮》創辦之始，傅斯年任主任編輯，羅家倫任編輯。一年後，傅斯年赴英國留學，則羅家倫繼任主編。《新潮》前幾期，也以他們兩人貢獻的文章最多。羅家倫回憶編輯《新潮》時候傅斯年的工作以及給他的影響：「《新潮》能有這種成就，得力於孟真最多。當時孟真和我雖然一道從事編輯的工作，可是孟真實為主編，尤其是開始的幾期。孟真把握新文化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四—七五頁。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三—七四頁。

運動的主張很堅定，絕不妥協，而選擇文章的標準又嚴。他批評的眼光很銳利，而自己又拿得出手。許多投來的稿，我們不問是教員或是同學寫的，如果還可取，就老實不客氣的加以刪改。我雖然同他一道做刪改文章的刀斧手，然而看見他這樣嚴格的標準，使我對於自己的稿子，也有戒心，不能不先慎重一點，才敢交出來。從這方面來說，我甚得孟真的益處。益友之所以對友能益，這就是一個例子。當時我的文章，雖然也有人喜歡看，可是我總覺得不如孟真的厚實，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我們後來重看當年我們在《新潮》上的文章，常覺慚愧。至少我對於我所寫的：永遠不願再印；可是在那時候廓清和興奮的力量，據說確是不小。）」羅家倫和傅斯年還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國書。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外匯非常便宜，所以他們每人每月都能向日本丸善株式會社買幾本新書；而「丸善」非常內行，知道他們的口味，於是凡是新到了這類的書，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郵局付款提書）的辦法寄來，弄到他們幾個手上的零用錢都被吸光了，有時眼見要看的書到了而無錢去取，只得唉聲嘆氣。他們於是常常交換書看，因此加了許多共同的興趣和見解。羅家倫和傅斯年的性格頗相得，吵吵鬧鬧但卻篤誠率真：「當年孟真不免有點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時彼此間不免因爭辨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見面不講話。可是氣稍微下去一點立刻就好了，因為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認識，以後成為彼此人格間的信任。我們都不免自負，可是我們都能努力做到屈伏在道理的面前。」²而傅斯年則回憶說：「志希和我，因為彼此都有好吵鬧的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四頁。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七—七八頁。

脾氣，幾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於氣忿忿的，不談話了。然而過五、六分鐘，仍然一切如常，任憑吵上多少次，我們總是最好不過的朋友。」¹

不過，就性情來說，傅斯年是那種「真」得「元氣淋漓」的人。這同羅家倫雖性格熱烈而某些時候又頗能隱忍不同。傅斯年死後，羅家倫傷心地說起在傅斯年去世前兩天他還用諷刺的話來激勸傅，要他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結果反引起傅斯年一頓反攻。羅家倫說：「孟真好動氣而不善於養氣，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於他辦事太認真，和是非觀念太強之所致。一個優點裡可以帶弱點，一個弱點也常由優點出發。」²傅斯年是喜怒哀樂形於色，不假虛飾之人。對於傅斯年此種性情，羅家倫的回憶中有數例可資說明：其中一個是五四時候，「孟真在五四的前夕，是參加發難的大會的，為當時被推的二十個代表之一。五四那天，他是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住宅的。不知為何第二天在開會的時候，有一個衝動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學，同他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裡來工作。可是他在旁還是起勁，大約他看見書詒出來主持一切，他可以放心了。」³

傅斯年同俞大維的妹妹大彩結婚後，他常向羅家倫誇獎大彩的小品文寫得如何好，小真書寫得如何好，言之津津有味。有一次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大彩賞識你，如九方皋伯相馬。」傅斯年「為

1 《傅斯年選集》第三冊，臺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四八頁。轉引自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八七頁。

3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八頁。

之大怒，要來扑我」。又有一次，傅對羅盛誇他的兒子仁軌如何聰明，羅帶笑地說：「犬父竟有虎子。」傅卻為之大喜。羅家倫於是說：「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滿了人性的人。說到聰明的孩子仁軌的命名，確有一件可紀念的故事。有一天孟真對我說：『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個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軌。』我一時腦筋轉不過來，問他說：『為什麼？』他說：『你枉費學歷史，你忘了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¹

苦苦地熬過八年抗戰，最後得到了勝利，在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的晚上，傅斯年欣喜若狂。「孟真瘋了。從他聚興村裡住所裡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結果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眾和盟軍大鳴大鬧了好一會，等到叫不動鬧不動了，回到原處睡覺，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還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晦氣，晦氣。』這是孟真的本色，孟真不失為真！」²

「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孟真反對孔庚的議案，激烈地辯論了一場：當然孔庚辯孟真不過，於是仍氣了在座位上辱罵孟真，罵了許多很粗的話。孟真也氣了，說是：『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孟真在會場門口攔著孔庚要決鬥了。他一見孔庚年紀七十幾歲，身體非常瘦弱，孟真立刻把雙手垂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這雖然是一個插曲，也可以看出孟真絕不是硬心的人。我常笑他『你這大胖子怎樣能和人打架』。他說：『我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八三頁。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八四頁。

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¹

在才情和智力上，羅家倫曾把新文化運動比做法國的啟蒙運動，把傅斯年比做伏爾泰：「若是新文化運動好比法國的啟蒙運動，那麼上面說的風氣，也頗有一點像當時法國『百科全書家』（Encyclopaedist）的風氣。雖然各人的造詣和成就，各有不同，也就各有千秋，絕難對比。而孟真的號召力和攻擊精神，則頗與伏臺爾（Voltaire）相似。他們都願意為自由和開明而奮鬥，對於黑暗和頑固有強大的摧毀力，而且愛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處。不過伏臺爾不免刻薄，而孟真則厚重，伏臺爾有些刁鑽古怪，而孟真則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時把伏臺爾的精神，裝在賽繆·約翰生（Samuel Johnson）的軀殼裡面（約翰生是大胖子）。孟真在後來對伏臺爾的觀念有改變，我不知道，可是當時他卻是恭維他。」²

說到此，還有一件趣事。羅家倫有一次和傅斯年開過一個大玩笑，大約是一九二四年，蔡元培重到德國，傅斯年和羅家倫，還有幾位同學，「陪蔡先生同遊波坎坦的無愁宮（Sane Souci），行經佛雷德烈大王招待伏臺爾住的房間，房中有一個大理石雕刻的伏臺爾像，非常精美。孟真頗為欣賞流連。因此落後了。我回身去找他，同他回群以後，蔡先生問我孟真在看什麼。我以頑皮帶笑的态度，當面編了一個故事，說：孟真在對伏臺爾深深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詞，我聽他念的是什麼，原來是李義山『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實憐君』那兩句詩。孟真氣得要上前來打我。我大笑和蔡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八四—八五頁。

2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八〇—八一頁。

先生側邊一閃，蔡先生也不禁失笑，於是孟真的幽默跟著就恢復了。至於說孟真像約翰生，他倒不以為侮的；有時他拍拍肚子，還以他自己是胖子自豪。」¹

傅斯年後來堅持反對共產黨，但和國民黨的關係也與羅家倫、段錫朋這些好友不太一樣，倒要接近於胡適那種「諍友」的位置。他和胡適的關係也要更近。

《新潮》編輯

在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無疑是《新青年》雜誌。《新青年》的編輯、作者主要是羅家倫的師長輩，比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這些人。羅家倫回憶當年新青年諸人以及文學革命的過程：

當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他就任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誌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誌的主幹，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之後，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因為胡適本來於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於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八一頁。

適之氣焰因而大盛，這裡彷彿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麼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一封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得不大起。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只宜於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於做學術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遍，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幹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裡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他的哥哥錢洵，做過義大利公使的，錢玄同很怕他的哥哥，他在外面一向主張很激烈的人，然而見到了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了。他當時主張廢姓，主張廢漢字，因此大家更覺得這種主張可怕，而更覺得錢玄同是同瘋子一樣。沈尹默也是一個編輯，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

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會做，但是因為他常做白話詩，而胡適之讚賞他的詩做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六編輯之一。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他的中國文字太壞了，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能得簡，且沒有綜括之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以後他還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為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為一位編輯了。第六位編輯是劉半農，他的地位和工作，我以前已經說過一點了，當時大家對於他很重視，乃是一種實在情形。以後北京大學派他到法國研究音韻學對於他乃是一種很大的幫助。《新青年》除了六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周作人是極注意於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寫成的。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子民做教育總長時找他進部的。以後他宦隱於教育部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¹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從羅家倫的這番記述，非常生動地傳達了新文化運動現場的氛圍。即使考慮到他本人立場的原因，也還是很可以嗅出對新文化運動主流描述之外某些非常有趣的東西。陳獨秀的激烈，胡適的謙恭；時人對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目為怪誕或看不大起；陶孟和食「新」不化；胡適那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淺薄，但在過渡時代裡卻能投人所好；新文化運動史上有名的「雙簧信」在時人眼中卻頗流於下作，……這裡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之「新」在當時是多麼生澀的東西，而即使如此生澀和怪誕，其勢亦不可擋，確乎是中國文化三千年不曾遇到的大危機下，國人「求新求變」的心理已經累積到必然衝決而出的時刻。對於新文化運動幾位主將的性格因素，某些研究者已有論及¹，羅家倫的記述是一份可資印證的資料。正如梁漱溟所說，胡適額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脈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獨秀之精闢廣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從而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陳獨秀激烈、強悍、果敢甚至獨斷的作風或許正是新文化運動猛然爆發成勢的重要因素，而胡適溫文、恭謹甚至優柔的性情正是要藉著那些更猛烈更獨斷的力量才能衝決而出。

受《新青年》的影響，在北大學生中也創辦了幾份刊物，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新潮》。《新青年》的編輯作者群多是《新潮》的編輯作者群的師長們，他們之間的關係亦真實反映在《新潮》對《新青年》倡導之新文化運動的熱烈呼應和大力襄助上。《新潮》的主創者是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傅斯年回憶當年創辦《新潮》的緣由：「六年的秋天，我和顧頡剛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

¹ 例如，陳平原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中就作了這種路向上的一些分析。尤其羅家倫對胡適和陳獨秀風格性情的記述，對陳著所見是很好的印證。

號裡，徐彥之君是我們的近鄰。我們幾個人每天必要閑談的。有時說到北京大學的將來，我們抱很多的希望，覺得學生應該辦幾種雜誌。因為學生必須有自動的生活，辦有組織的事件，然後所學所想不至枉費了。而且雜誌是最有趣味，最於學業有補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動生活。再就我們自己的脾氣上著想，我們將來的生活，總離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麼，我們曷不在當學生的時候，練習一回呢。所以我們當時頗以這事做談話的資料。頡剛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羅志希君，常加入我們這閑談。不過當時僅僅是一種希望的意思，覺得赤手空拳，何從做起，簡直和戲論差不多。中國的讀書人有一種『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習慣，這個希望也是我們群居的一種消遣品。」¹羅家倫回憶說：「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誌，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於是《新潮》雜誌便應運而產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為 *The Renaissance*，也可以看見當時大家自命不凡的態度。」²但是想歸想，談歸談，辦一份雜誌總歸還得有物質上的準備，這一點，是得到了師長們的支持才得以解決的。「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談起這層事。子俊說：『何如竟自嘗試一回呢？不成功也沒甚麼不可以。』於是乎作了個預算。最難的是經濟方面，社員分配擔任外，不夠還多；至於文稿，或者不至於很拮据。我們想，我們都是北大的學生，學校或者可以幫我們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陳先生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擔負。』這是我們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九月。

2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初料所不及的，就約集同人，商量組織法了。最先和羅志希、康白情兩位研究辦法，其後有十多位同學加入，對這事都很有興味。胡適之先生做我們的顧問，我們很受他些指導。」¹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新潮社的第一次預備會中，確定了《新潮》的名稱和性質。徐彥之（子俊）將英文名定做 *The Renaissance*，同時羅家倫要定中文名做《新潮》，兩個名詞恰好可以互譯。對於雜誌的性質和風格，確定了三點：

- 一、批評的精神；
- 二、科學的主義；
- 三、革新的文詞。

第二次會議在十月十九日召開，新潮社正式成立了。確定了社中的職務，著手籌備稿件。當時確定的職務名單是：

編輯部

主任編輯 傅斯年

編輯 羅家倫

書記 楊振聲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九月。

幹事部

主任幹事 徐彥之

幹事 康伯情

書記 俞平伯

新潮社成立之後，李大釗把圖書館他辦公室右側的一個房間撥給新潮社作編輯室用。《新青年》幾位主將對《新潮》的支持，也可見得這些師長的提攜和厚愛。對於新潮社的宗旨，羅家倫有更詳細的說明：

民國七年，孟真和我還有好幾位同學抱著一股熱忱，要為文學革命而奮鬥。於是繼《新青年》而起組織新潮社，編印《新潮》月刊，這是在這個時代中公開主張文學革命的第二個刊物。我們不但主張，而且實行澈底的以近代人的語言，來表達近代人的意想，所以全部用語體文而不登載文言文。我們主張文學主要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應當著重從這個方面去使文學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們力持要發揚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與反人性的文學。我們主張學術思想的解放，打開以往傳統的束縛，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我們推廣這種主張到傳統的社會秩序方面，而對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加以批評。我們甚至於主張當時最駭人聽聞的婦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濃，可是我們堅決主張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們主張我們民族的獨立和自決。總而言之，我們深信時至今日，我們應當復位價值標準，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學的方法和哲學的態度，來把我們

固有的文化，分別的重新估價。在三十年前的中國，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離經叛道，驚世駭俗。我們主張的輪廓，大致與《新青年》主張的範圍，相差無幾。其實我們天天與《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觸，自然彼此間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不過，從當時的一般人看來，彷彿《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復印到三版，銷到一萬三千冊，以後也常在一萬五千冊左右，則聲勢不可謂不浩大。到了民國八年上半年，文學革命運動已經擴大為新文化運動。等到五四運動的巨浪發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這股偉大的思潮，在許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紀後期由法國開始，以後彌漫到全歐的「啟明運動」。（這個運動，英文名叫 Enlightenment，意為啟明。而德文稱為 Aufklärung，帶廓清的意義，似更恰當。）¹

《新潮》創刊號於一九一九年元月元日出版。二十開本，一百五十頁。其中共有二十一篇文章，而傅斯年和羅家倫兩人就寫了十四篇之多。傅斯年的《〈新潮〉發刊旨趣書》和羅家倫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兩文，標明瞭雜誌的宗旨。對於《新潮》當時的影響，羅家倫回憶說：「這個雜誌第一期出來以後，忽然大大地風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個月又是三版了，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以後亞東書局拿去印成合訂又是三千份。以一部學生所做的雜誌，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辦這個雜誌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了，銷數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種害怕的心

1 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七五—七六頁。

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確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當時負責編輯的是我和孟真兩個，經理人是徐彥之和康白情兩個，社員不過二十多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幾位，孟真當時喜歡談哲學，談人生觀，他還做了幾個古書新評，是很有趣味的；我著重於談文學和思想問題，對於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地批評。有些文字，現在看過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當時於破壞方面的效力，確是有一點。比較起來，我那篇《什麼是文學》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也很受當時的注意。頡剛的文字，多半是關於抨擊舊家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關於婦女問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在當時大家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了，拿去給徐世昌看，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還得了。於是徐世昌拿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於蔡子民，要他辭退了兩個教員，開除了兩個學生，就是當時所謂四凶，這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蔡子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他覆林琴南的那封信，不只是對林琴南說話，並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林琴南的背後是徐樹錚，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當時軍人派之意見；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之反對，其情形之危險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子民這一封信得到了絕大輿論上之勝利，反因而學術界對他非常敬仰，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的地方。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到了這個時候，其勢遂不可遏抑。」¹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冊，一九七八年五月。

通過《新潮》，可以看到羅家倫與《新青年》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同胡適新文化運動思想的互動，其女羅久芳有過一番總結：

一九一九年元月《新潮》創刊號內，包括了許多篇學生們醞釀已久的議論。羅家倫響應文學革命的第一炮《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是一月一日完稿的。針對時下爭論中缺乏「文學」的定義，他從西方學說中探討許多不同的解析，進而向中國傳統文學挑戰，並且認為「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裡寫下來的有思想、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眾長，能使人類普遍心裡，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他第二篇將近兩萬字的《駁胡先驕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發表在同年《新青年》第五期，是以學習西洋文學的心得，來逐句逐段駁斥這位留學英國的東南大學教授對胡適和陳獨秀的猛烈攻擊。其中他特別推崇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對於「死文學絕不能產生生活文學」的譴論；同時也提出他個人對文學、藝術和人生的看法，認為：一、藝術是為人生而有的，人生不是為藝術而有的；二、要承認時代的價值，在這個時代就應當做這個時代的人，說這個時代的話；三、所以應當注重世界文學的分析和研究。中國的白話運動，乃是與世界文學接觸的結果。以上兩篇文章，多年後羅氏仍然覺得在當時確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一九二〇年羅家倫在赴美留學的船上完成了另一篇長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發表在十二月的《新潮》上。文中他將「近代」分成幾個階段來分析，在「國語文學」這一階段中，說

1 參見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明新文學的勃興，乃是人生覺悟後應乎時勢所萬不能免的；並且強調「胡適之先生最初創議的那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所提出來的四條，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但是他認為新文學必須以新思想作為基礎，才能發揚光大。接著又發揮了胡適一年前在《新思潮的意義》文中所立下的定義，即是用「評判的態度」來研討社會、歷史、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

至於學生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胡適本著其一貫的那種誠懇謙抑的態度評論說，「這份《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皆佳。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¹

《新潮》創刊之初，傅斯年是主任編輯，羅家倫是編輯，他們是投入極大熱情和精力的兩個主創者。依新潮社社規，該社社員均為《新潮》雜誌的供稿人。每年發刊十期，每五期為一卷，每卷終了時即進行職員改選。第一卷的五號是嚴格這樣執行的。第五號出版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此後由於五四運動爆發，《新潮》諸人都忙於「五四」的各種活動，於是第二卷第一號延至同年十月才出版，第二卷第二號又延至同年十二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新潮社成立一周年，並在這天舉行在京全體社員大會，改進社務，改選職員。組織也做了調整，把原來的編輯、幹事兩部制，改為編輯一人，經理一人，記錄校對等多人。傅斯年於是年秋考上山東公費到英國留學去了，人員改選的結果，便由羅家倫來擔任編輯。事實上，自傅斯年走後，羅家倫就已經全力承擔起《新潮》的編輯工作。在第二卷第一號中，一個人就寫了七篇文章，第二卷第二號又有一篇論文，一篇演講

1 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記錄，兩篇評論，一篇書評和兩通復信。這件苦差事直到一年後他也赴美留學為止。《新潮》一至一卷六十六位作者中，傅斯年發表的文章最多，有四十四篇。羅家倫次之，有時署名羅家倫，有時署名志希，共計三十六篇之多，內容包括論文、評論、詩歌、書信等。目次如下：

《新潮》一卷一號（一九一九年元月）

今日之世界《新潮》

羅家倫

評壇（說明）

志希

今日中國之小說界

志希

今日中國之新聞界

志希

一卷二號（一九一九年二月）

什麼是文學——文學界說

羅家倫

雪（詩）

羅家倫

一卷三號（一九一九年三月）

「除夕」入香山（詩）

羅家倫

是愛情還是苦痛

羅家倫

一卷四號（一九一九年四月）

今日中國之雜誌界

羅家倫

「出世」？

志希

通信——答易君左

羅家倫

一卷五號（一九一九年五月）

駁胡先驕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

「解答幾種對於白話文學的疑難」

通信——答楊鐘健

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十月）

婦女解放

天安門前的冬夜（詩）

歡迎我們的兄弟——牛津大學的《新潮》

古今中外派的學說

杜威博士的《學校與社會》

杜威博士的「德育原理」

少年中國月刊

二卷二號（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

思想的派別（杜威講壇）

學術界的騙局

是青年自殺還是社會殺青年？

解放與改造

羅家倫

志希

羅家倫

羅家倫

志希

志希

志希

志希

志希

羅家倫

吳康、羅家倫

志希

志希

志希

通信——覆張溥泉·····	羅家倫
通信——覆施存統·····	羅家倫
二卷三號（一九二〇年四月）	
往東車站送楚僧赴法（詩）·····	羅家倫
輿論的建設·····	羅家倫
批評的研究——三W主義·····	羅家倫
二卷四號（一九二〇年五月）	
余談（一）·····	志希
通信——覆熊子真·····	志希
通信——覆何思源·····	志希
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羅家倫
二卷五號（一九二〇年九月）	
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	羅家倫
三卷二號（一九二二年）——一九二〇年世界名著介紹特號	
杜威的《哲學改造》·····	羅家倫

五四旗手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現在論者們有諸多爭論，就是當年親歷者們的看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羅家倫對他親歷的新文化運動和學生政治運動的理解中，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布滿全國，中間還有兩個政治運動在裡面，第一個運動是比五四運動早一年，因為反對對日的參戰借款和中日密約而起的。那時候是馮國璋做總統，段祺瑞做內閣總理，這個反日運動，是由日本留學生發動的。有一天晚上，兩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其中一個叫阮湘，在北大西齋飯廳慷慨激昂地演說，大家莫不義憤填膺，但終覺束手無策。最後羅家倫自己跑上講堂對著大家發表了一通煽動言論：「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¹《新潮》這句話說出來以後，大家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當場表決，第二天去闖新華門。到了那時候，果然北大學生還同其他幾校的學生，集合在新華門口，一直圍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家才散。羅家倫認為：「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次，也是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這是五四運動的先聲，然而這件事卻很少有人提起（說句沒出息的話，這也是民眾請願的第一次）。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謂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²

這件事卻使得校長蔡元培處境艱難，等羅家倫他們回來之後，方知道蔡元培為此而提出辭呈。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2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好一部分愛護學校的同學頗責難羅家倫，顧頡剛更是把羅痛罵一頓。後來頗費些周折，馮國璋把蔡元培的辭呈退回了。羅家倫等人也去向蔡元培解釋這件事體，完全是同學為著國家大問題而出，不是不顧北大。經過一再解釋，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下來。羅家倫說這次事件是五四運動的先聲，也許不無道理，不管怎樣，這都顯示了當時學生愛國熱情因為時勢而激化，不得不走入政治抗議的愛國行動。而蔡元培這次的辭職，也呼應了五四之後他更加堅決的辭京南下之舉。蔡元培對學生的愛護、支持和營救固然非常明白，但這個問題的背後，仍然存在力學報國之責和當下政治行動間的衝突。蔡元培固然不會不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他在各種場合，不忘諄諄教誨學生當以學術教育作為救國任重道遠之計，對於學生犧牲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學生運動，他感到痛心。此痛心，亦復無奈。既以學生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從事救國之運動，他無可非難，也認為學生之所以如此，誠不得已也。作為人生經驗和閱歷都要深厚的師長，救國乃長遠恆久之業的認識，在蔡元培、胡適這些人心中都是堅定不移的信念。而當時的青年學生，固然也了悟得師長們的心願，但作為信念，大概還沒能自覺和堅定如斯。一旦受到時勢刺激，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一定是把他們愛國的熱情和勇舉立時付諸行動。

對於五四運動的原因和過程，以及他個人所扮演的角色，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有詳細的記述，儘管不排除個人之見的因素，但藉助這個親歷者的身份，我們也可以獲得一個觀看五四的視角：

現在講到五四運動了。五四運動產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幾種：第一，是前次新華門事件

的連續。第二，是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子民的影響，一變從前羨慕官僚的心理而為鄙視官僚軍閥的心理，並且大家有一種以氣節相標榜的態度，感覺到中國受人支配和帝國主義國家協以謀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裡，朝鮮發生徒手革命，也給大家以深刻刺激（當時我到北大圖書館裡面去看報，注意到大家都在搶著關於記載朝鮮徒手革命的報紙看）。第五，因為受歐戰以後各國革命潮流的激蕩（特別是當時蔡子民所提倡所謂德國是軍國主義，戰敗是應當的，並且當時國際聯盟的論調甚高，北大也常常有這一類的講演）。以上是這個事件的原因，至於這件事體具體的釀成，都完全由於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在四月裡，日本要求中國撤換兩個專使的消息紛紛傳來，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會，並且捐了幾百塊錢打電報，一方面打電報給巴黎和會中國代表，要求他們堅持，一方面通電全國，反對因為外國壓迫而撤換本國專使的事，這兩個電報打出以後，所捐的電報費還存三百元左右，於是用四個幹事的姓名，共同負責，存在學生銀行裡面。到五月一、二號的時候，外交消息，一天惡似一天，傳孟真、許德珩、周炳琳、周長憲和我等幾個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種積極反抗的舉動，但是我們當時一方面想對於國事有所主張，一方面對於北大又要保存，所以當時我們有一種非正式的成議，要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外率領一班群眾暴動，因為這樣一來，北大的責任可以減輕。五月三日那一天，清華大學舉行紀念典禮，許多北大的人，都到清華去參觀，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回來。不料三號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在校的一班同學，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最初由邵飄萍報告，以後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有一個劉仁靜（他現在是共產黨中很重要的人物），當時還不過十八歲，帶了一把小刀，要在大會場上自

殺。還有一位，要斷指寫血書的，於是當場主持的幾個人，不能維持我們以前決定的五七發難的成議，當場議決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聯合各學校發動，並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個委員負責召集，我也是其中一個，由他們各學校聯絡進行。我們九點鐘由清華回來，看見他們會也要開完了，什麼決議都已經定好了，當時我們還在埋怨許德珩，我們說好在五月七日發動，而現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斷送了嗎？可是埋怨儘管理，大家的決議還是大家決議，是不能更改的。於是他們叫我連帶簽了字，把前存學生銀行的三百元拿出來買竹布，費了一夜工夫，請北大的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學生各個有旗子外，其餘還可以送給一旁的學校。（所以當時大家疑心五四運動以為有金錢作背景，不然為什麼以北大窮學生臨時有這許多錢去做旗子呢？其實這個錢是打電報省下來的。）各代表當夜分途至各學校接洽，約定了在第二天一點鐘在天安門會齊。當夜十一點鐘的時候，各代表在北大開了一個預備會議，當場舉出了三個總代表，一個是我，一個是江紹原，一個是張廷濟，並且當時推我寫了一個五四運動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學印刷所去印了五萬份，第二天的早上，我們還預備了一個英文的備忘錄，送給各國使館。到下午一點鐘，大家便齊集在天安門了。我們三個所謂總代表，因為預備各種文件，一直到一點十分才到天安門，當時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都已經先我們而到，對大家講了一番話，勸大家解散。當時眾怒難犯，那一個肯聽？於是大家從天安門出發，一走走到東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擋住了。只有我和江紹原兩人進去到使館內去找美國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參贊出來見我們，他對於我們很表示同情，說了一番很漂亮的話，並且說，由他去和使館界的警察交涉，讓他放我們通過，我們從美國公使館出來以後，又到了別的幾個使館，告訴他，我們示威的意

思。回轉身來到美使館去問美參贊，同使館界警察交涉允許我們通過的結果怎樣。他說，使館界的警察是答應可以的，但是剛才警察總監有電話來，說是不可以讓學生們通過，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辦。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大家更是憤怒，當我們報告交涉經過的時候，大家便要求我們硬擠進去，後來想硬撞不成事體，反而給別的國家不好的印象，於是大家便高呼口號「我們去除國賊吧！」於是掉轉大旗向曹汝霖家前進（曹家在趙家樓），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滿洲王府式的平房，我們到他家門前，大門已經關了，門口站著一大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大家到門口便大罵國賊，最初拿旗子向屋頂丟去，後來打破了一個短牆的窗子，大家便爬進去，首先進去的人，據我眼睛所看見的，乃是北大的蔡鎮瀛，一個預理科的學生，和高等工業學校一個姓水的。大家看他們進去了，於是接上爬進去的幾十個人，把大門打開，而曹宅的院子裡還站著許多警察，因為學生向他們極力宣傳，所以他們已沒有什麼抵抗。適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陸宗輿和一個日本資本家在那裡商議事情，他們以為有著警察保護是不要緊的，我們打進去的時候，曹汝霖便換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裡，從後牆跳出去，陸宗輿怎樣逃走，我們卻不知道，聽說他也來喊口號，喊打倒賣國賊，混在群眾裡面逃走的，是否確實，卻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較老實，他和那個日本人一道躲在一個小房間裡，群眾跑進去的時候，日本人還掩護著他，於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要人。群眾便把他們圍起來了。不久一個北大的校工進來，他說自己是認識章宗祥的，並且說這就是章宗祥，於是大家便動手打起來，打了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哄而散，於是這個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間雜貨店裡面，這個日本人也去了，於是群眾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後門雜貨店中找著了，當時這個日本人還掩護著他，群眾們使用雜貨店中

雞蛋來丟這個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來，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所以當時章宗祥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曹家的裝飾品、古玩……簡直是打得乾乾淨淨，他的姨太太和他的女兒的房子裡許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當時香氣四溢，不可向邇。我還親眼看見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裡，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至於放火的舉動，乃是高等師範的學生開始的，我看見有兩個學生，自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來，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那時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記簿，上面寫著許多代表名氏的，往火裡一丟，馬上燒掉了。我們還是從前門出來的，當時街上的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擁擠不堪，很難通行。在曹宅裡面還沒有出來的，還有幾十個人，於是便當場被捕。我從趙家樓出來以後，便向北大東齋（即第一宿舍）去，當時自己實在疲倦極了，從五點鐘睡到六點鐘，六點鐘以後，重新振作精神開始活動。當時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家學校聯絡，預備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學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罷課。那天晚上適派我到各報館去解釋這件事體，等到十幾家重要報館都跑空以後，時候已經是半夜三點多鐘了，所以那一晚便沒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專門以上的學校，一律罷課，並且各校代表齊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課堂開會。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也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當時各學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學，至於北大主持這個運動的軀幹，要算是新潮社及國民雜誌社裡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經開了一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我當時

因為在各處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願意做會場上固定的事，經大家一想再想，最後推出段錫朋來，由他做北大學生會的代表，結果就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主席。段錫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學生，很少知道他的，他總是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開口就是我們廬陵歐陽公的文章氣節，所以大家都當他有幾分迂氣，哪知道被選舉出來以後，他處理事務非常靈敏，運用群眾，大有特長，於是段錫朋的名氣陡然間聞於全北京。這一次蔡子民先生確是有一種特別的表現，就是五四事情出來以後，他不和前次一樣的辭職，反而聯合各大學的校長，負責地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們接洽好了，聽說吳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長於五月七日命令全體學生復課，以此為條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學生。徐世昌也有這樣主張，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的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就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我們全體罷課的決議，乃是五月五日通過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點多鐘，蔡子民及湯爾和（醫專校長）以及其它專門以上學校的校長，到北大的校長室裡面，把我們找去，說是現在同吳炳湘已經有這樣一種了解，只要明天全體復課，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當時去見這幾位校長的，有我及方豪（倬新）等四五個人，他們都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復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我說：「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此我便問他們幾位校長說：「若要我們明天復課，他們不放人，怎樣辦？」他們說：「我們可以用用生命人格為擔保，而且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復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我以為既然如此，我們明天復課好了。但是我這句話說出來，許多

人便反對，以為我們答應下來乃是越權，許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對我意見。我說：「現在為減少被難同學之危險，這件事非如此辦不可，我們只有從權辦理了。」於是當夜我們分成五隊，去通知全體同學，明天復課。除每個宿舍派一隊外，其它兩隊，是負責通知宿舍附近公寓裡面的同學的。大家出發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同學們完全睡著了，一個一個房間敲起門來，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訴他們這件事，他們還不相信，還要費許多心血去解釋，解釋不明白的時候，還要受大家的責罵。半夜醒轉過來的人，相對講話，口中臭氣是最令人受不了的。這可以說是我在那一晚上特別記得深刻的一種感覺。幸而能得大多數同學之了解，謝謝大家對於我們還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學亦先後復課了，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同學從警察所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於亂離巨劫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當時章宗祥的病還沒有脫離危險期，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間死了，他本來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為走路過多，身體過勞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確實的，這是我們應該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國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點滑稽。等到被捕的全放出來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燒了，照常理說，這件事情可以告一個段落，但是當時有兩種情形，是絕不能使這件事告一個段落的，一件是山東問題還沒有了結，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敗下去；一件便是蔡子民先生於五月七日學生出獄

以後，便當夜出京，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時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這封信的頭兩句話如此）這封信出來，許多人很費推測，於是大家去詢問國文教授，請他們去查這個典故的來源。因為這些國文教授見大家紛紛請教，當時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後，北京大學自然是第一個恐慌，為維持北京大學，北大學生不得不繼續鬧下去，而且不能不聯合一旁的學校學生一同的鬧下去，於是五四運動又重新緊張起來了。

經過這次事變以後，北京大學遂成為政府的眼中釘，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為鑰除外交上的障礙，政府方面，也很想對於北京的學生界下一番毒手，這個情形，學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學生運動已到了一籌莫展的地步，於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一批南下的就是段錫朋、陳劍脩、許德珩、黃日葵、祁大鵬（中國大學）、瞿世英（燕京大學）等，他們到了上海以後，就聯合上海及各省學生代表組織全國學生聯合會，到了五月底，各處的布置已經有點頭緒了，於是我們在北京接到段錫朋的密電，說是可以相機發難。到六月三日的那一天，於全北京的學生裡面，挑了五百多人，分隊出發演講，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繼續派人出去演講，大家都帶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預備被捕的。當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達九百人之多，監獄關不下去，於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為臨時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層層的刺刀和機關槍守著，如臨大敵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們想把恐怖的新聞電打出去，我就帶了四十幾塊錢去打電報，知道我一出去，偵探便跟著我，於是跑到日本郵局去拿一本丸善株式會社宮來的書。偵探在前面守著，知道那個日本郵局有一個後門，我就從後門走了。結果，居然被我把那個電報拍到上海去。上海方面接到這個電報以後，全體學生便出發，除分散傳單外，並向各家店鋪，要求

他們罷市，甚至於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著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咱己腦殼一打，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因此，這個北京學生與政府正在短兵相接的時候，學生方面，正是無可奈何的時候，忽而得到了這種有力的聲援，一剎那間，個個悲歡交集、哀痛淋漓，而聲勢遂大振。當時上海、天津方面所提出要求政府的條件，第一，就是釋放被捕學生，第二，就是罷免賣國賊曹、陸、章，第三，就是不簽巴黎和約。而三個條件之中，以釋放學生為先決條件，所以五號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軍警的帳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當時拘禁在裡面的學生還不肯出來，因為他們一出來要減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緊張空氣。到了第二天，步兵統領衙門和警察所卻派人來道歉，他們才肯出來，還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門裡面的，他們請他們出來，而卻不肯，以後預備了汽車和爆竹送他們出獄，還是不肯。最後一個總務處長連向他們作揖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了，趕快上車吧！」至於罷免曹、陸、章的命令也隨著下來，以由學生運動擴大成的民眾運動，使內閣局部改組，在當時看來，也算是一件可以詫異的事情了。不過山東問題還沒有拒絕簽字，北京教育界還有受摧殘的危機，這兩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到七月和約要簽字的時候，北京大學聯合各校學生又會在新華門一次，在新華門門口，睡了兩天兩夜。同時巴黎方面的學生同華僑，也就聞風興起，逼迫中國專使，不許他簽字。拒約運動，因為內外夾攻，所以終能實現原來的主張，而為後來華盛頓會議留下一個爭回山東的餘地。至於北京各大學被摧殘的問題，也是使大家寢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子民先生，所以他們要胡仁源來買通一批投考的學生，來占據北大學生會，硬把學生會的圖章搶去，以學生會的名義，歡迎胡仁源到

校。同時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預備好上任的汽車，誰知此謀不密，被北大學生會中人知道了，當時便召集緊急會議，每一個人發一個特別符號，集合在第三院，時三院的被買及投考學生，正議「奪帥印」的事，還沒有完結，哪知這邊去了兩三百個人，一個個的把他們擒住了，並且帶了紗麻繩把他們捆將起來，便在法科大禮堂設立公案，舉出了五個審判官，來審判這些人的罪狀，他們也陸續地把被買經過供將出來，大家又逼他們寫悔過書，寫了悔過書還要他們在悔過書上蓋手印，再拍了一個相，然後把他們放了。這幕滑稽，遂因此終了，而他們搶北大的計劃因而失敗，但是他們卻繼續進行向法庭控訴北大學生會的職員，以為私設法庭和逼迫人行使無義務之行為（這條法律怕是永久沒有人用過的）。於是法庭拿了學生會裡面二十餘人下獄，其中有孟壽椿、魯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時候，學生會要我去做代表，我幾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師劉崇佑接洽。許多上訴狀都是我寫的，這場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許多關於法律的知識。這一幕取成都的戲沒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據，他們的野心，亦因此而減少一點。那時候蔡子民先生派蔣夢麟先生到北大來，以總務長的資格，做他私人的代表。到雙十節左右，學生會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應回來。在蔡先生到校時候，剛巧是雙十節，各學生便捐了一批錢，教員也捐了一些錢，共幾百塊錢去買了幾萬個饅頭，上頭蓋著紅戳子是「勞工神聖」四個字及其他成語，在那天便分發於北京各平民，由北大學生去發，這真是麵包運動，也是一件值得回憶的事。當時北大的學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間房子中住著七八個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個人，說起飯來，包飯只有四塊五毛包一月，兩塊錢是現洋，兩塊五是中交票（當時中國交通銀行的票一塊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飯只合三塊錢，當時學生在吃飯時候，除了五個菜以外，每人還分兩個饅頭，大家搶著吃，吃飯是先

打鑼的，故有「鑼聲動地，碗底朝天」之謠，這是北大生活的一點回憶，是附帶記載於此的。

五四運動到了這個地方，似乎應該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為要逼迫政府取消軍事協議，學生和政府又起了一個大衝突，這個衝突，使北京大學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的被圍，當時政府有命令通緝我和方豪等幾個人，我當時住在嵩祝寺八號，到吃飯的時候，忽而來了八個馬隊，把我前門圍住了，我從後門走到黃振玉（現在南京中央飯店的經理）的家裡，由他家裡帶了一副黑眼鏡和一頂風帽，逃到北大一院，因為他們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張國燾（現在共產黨的領袖）一同去，在傍晚時分，我便由一院後門逃出，經過鐵獅子胡同，想到永定門上車（只有普通快車是在永定門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門，車已開了，於是跑到李光宇家裡坐了半夜，半夜時候，又到永定門去上車，車又開了，於是我只得和張國燾坐待城門開門，當時很怕守城的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因為城門上有自鳴鐘，縱有雞鳴狗盜也一律不濟事的，我們等他開城門，總是不開，到城門開了，火車又走了，於是我們兩個人只得直接沿著火車軌道走去，到了豐臺，登車南下。南下過了一個多月，又回到北京來。這段故事雖然是我自己的經驗，寫在此地，也算是五四運動的餘波吧！

羅家倫對五四運動的回憶，非常詳細而生動，很多細節的描述妙趣橫生。而對於五四運動的動因、發展、作用、影響等，也作了一番理性的觀察和反省。值得注意的是，羅家倫在非常明瞭蔡元培對學生運動複雜的情況下，一再強調五四愛國運動之所以產生，五四青年學生具備的品格和志趣，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所煥發的愛國熱忱，正是蔡元培執掌北大所鑄造出來的精神。因此他說：「從整頓北京大學，改革課程內容，喚起青年對於自身人格的重視以至於產生文學革命和所謂新文化運動，對於社會的制度、固有的權威加以理性的批評和大膽的攻擊，再至於產生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一般青年和民眾直接參與國家問題和社會運動的開始，這一個大波瀾雖然是種種時代的動量促成成功的，但是當時蔡子民時代的北京大學，是一種動力的發動機，是將來寫這個時代歷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¹羅家倫文中細緻的回憶，也使得我們了解到當時學生出於對蔡元培校長的敬重，對學校的愛護，曾經費了不少心力商量妥當地減輕校方責任的辦法。至於對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他所持論，可以用另一篇文章中的話大略概括：「五四運動是一個學生愛國運動，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並不止是單純的遊行示威，我們說它是受當時視為『洪水猛獸』的新文化運動新思潮孕育的結果，並不為過。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後，社會觀念變得非常劇烈，新文化運動更趨澎湃。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性質雖不相同，精神卻是一貫。」²至於他後來一貫要提及的五四運動與國民黨的關係，實際上也是加入了自己的「黨派」、「家派」意識，是不大能讓人信服的。

對於羅家倫，特別值得一提的，在五四集會和隨後的遊行示威中散發的那份宣言，是由羅家倫起草的：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2 羅家倫：《對五四運動的一些感想》，臺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

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這段文字極為簡短，只有不到二百字，作為傳單，簡潔明瞭，鏗鏘有力。羅家倫也自稱：「這個宣言，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是比較有影響的一篇很短的文字。」²對這篇文字的創作過程，他自己有回憶說：「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點鐘，我方從城外高等師範學校回到漢花園北京大學新潮社，同學狄福鼎（君武）推門進來，說是今天的運動，不可以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學命我執筆。我見時間迫促，不容推辭，乃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寫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辦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萬張；結果到下午一時，只印成二萬張分散。此文雖由我執筆，但是寫時所凝結的卻是大家的願望和熱情。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³羅家倫似乎富有一種急智，類似五四運動這樣在事件緊要關頭立時需要拿出富有號召力和感染力的文章，他

1 羅家倫：《五四運動宣言》，《文存》第一冊，論著，第一頁。

2 羅家倫：《五四運動的經過和感想及青年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文存》第五冊，演講（上），第五六四頁。

3 羅家倫：《五四運動宣言》，《文存》第一冊，論著，第一——二頁。

多能之，他自己或稱之為「急就章」，但這種簡短有力，奪人耳目，甚至口號似的文章在那些時刻卻格外富有成效，這不得不說是輔助羅家倫成其事功的一大天賦。

五月二十六日，羅家倫以「毅」的筆名，在《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發表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這篇文章正是「五四運動」這一名詞的首創。胡適後來在《獨立評論》第一四九號一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中曾談道：「『五四運動』一個名詞，最早見於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記不得是誰的筆名了——在那一期裡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胡適這裡記不清的，那個筆名「毅」的作者就是羅家倫。這篇文章不但首創了「五四運動」這個名詞，而且及時總結了五四作為一個運動所蘊涵的精神。對於五四的精神，羅家倫寫道：

時間飛去了！五四運動的第一個紀念日卻是匆匆而來。逢著這第一個紀念日，不但我們身於其事的人有種深刻的感想，就是一切社會上的人也都有種感想。所謂感想，當然不僅僅想到得意的事，也總會感到失意的事。就是不僅想到成功，也必定想到失敗。……五四運動，的確有一種大成功。這種成功卻不是拒簽德約，也不是罷曹、陸、章，何以故呢？因為德約雖然拒絕，而山東問題還未見了結，曹、陸、章雖罷免，而繼任曹、陸、章者為何人，國人自能知之，所以僅僅以此為我們的成功，所見未免太小。我們的成功可以分為精神、實際兩方面說。

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救國」的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當時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評論》上做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其中就聲明我們的運動的價值，並不僅在於「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其實這兩句話，是在我五四早上所作

的宣言中造成的），我們運動的實在價值之所託，在乎三種精神。這三種真精神就是中國民族存亡的關鍵。……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唯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奮鬥，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死的也有，因志願未達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第二，這次運動，是社會制裁的精神。……當今中國的政府昏亂，法律無靈極了！一班蠹國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點國民在眼睛裡。唯有這次運動發生，不但使他們累累若喪家之狗，並且事後政府也不能不罷免他們。不但使他們知道社會制裁的利害，並且將他們在人民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也以此打破。

第三，這次運動是民眾自決的精神。……這次運動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團及國外人類表示，是中國民眾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避艱險，直接問罪，是中國民眾對內自決的第一聲。所以這次運動是「二重保險的民眾自決運動」。¹

至於實際方面，他認為有這樣一些絕大的影響：

（一）思想改革的促進。新思潮的運動，在中國發生於世界大戰終了之時。當時提倡的還不過

1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二卷四號，一九二〇年五月。

是少數的人，大多數還是莫名其妙，漠不相關。自從受了五四這個大刺激以後，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無論是誰，都覺得從前的老法子不適用，不能不別開生面，去找新的，這種潮流布滿於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談文學革命的，不過《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和其它二三個日報；而到五四以後，新出版品驟然增四百餘種之多。

其中內容雖有深淺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來而且敢出來幹，已經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話文章不過是幾個談學問的寫寫；五四以後則不但各報紙大概都用白話，即便全國教育會在山西開會也通過以國語為小學校的課本，現在已經一律實行採用。……

（二）社會組織的增加。……五四以前中國的社會可以說是一點沒有組織。……現在居然各縣各省的學生都有聯合會。……有好幾省已經組織成了什麼教職員公署。……自從五四以來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處也添了許多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氣工會聯合會。……現在如天津等處的商人有同業公會的組織，而上海等處商人有各馬路聯合會的組織。……若是大家參看毛澤東君的《全國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三）民眾勢力的發展。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眾的勢力，不能不說是一天一天的發展。許多的束縛，以前不敢打破的，現在敢打破了；許多的要求，以前不敢提出的，現在敢提出了。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觀以上精神和實際上的種種現象，五四運動的成績，也就可以想見。總之，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整個中國各個階層熱烈地「動」起來了！¹

1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二卷四號，一九二〇年五月。

以後他回憶五四運動，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就更加明確，對五四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同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更為強調：「至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有人以為他的成績，是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為後來收回山東之餘地，更有人以為曹、陸、章之罷免，也是一種未曾有之勝利，這都是皮相之談而已。五四運動真正的影響，第一是青年參加國事運動的開始，喚起了全國青年對於國家問題的意識。第二是把青年運動擴大成為民眾運動，造成了民眾的許多組織。第三是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因為必要經過了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及國語文學之勢力才能普及於青年及一般民眾身上去。」¹

羅家倫的回憶中細緻地記錄了他在五四運動中擔任學生代表，起草宣言，傳發新聞，聯絡各方，探望被捕同學，與警方交涉和周旋，甚至逃亡等等活動。等這些活動消停下來，他已經為之奔忙了好幾個月。五四運動對於他們這一代人來說，一生中都認為光榮和自豪，但事後他也意識到自己好不容易。

在五四運動過後一年的第一個紀念日，羅家倫寫下《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這篇文章，除了和《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樣申論了五四運動的精神、意義之外，還著意反省了運動帶來的正反兩面的影響，也一再提請他們對學業與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進行平衡。這一點，正是他的師長輩，如蔡元培、胡適等人所一直警醒的。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在於五四運動僅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僅過去一年，作為躬與其事的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對運動提出了深刻的反省：

我寫到此地，又復躊躇了一下。我又繼續想我方才以為一個人只想到自己的成功是最無聊的事，哪知道還是最危險的事。我們現在的失敗，就失敗有這裡。我更想到優點弱點是人類都有的，我們學生也是人類，當然也有優點弱點，又何必探自韜諱呢？……

……自從六三勝利以來，我們學生界有一種最流行而最危險的觀念，就是「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事都能辦，所以什麼事都要去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而且目標不專，精力不粹，東衝西突，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敵人也得乘機而入。何況社會是有機體的，世界上決沒有萬能的人，也決沒有一種特殊的萬能的社會。平心而論，以現在這樣齷齪腐敗，草昧蒙塞，百孔千瘡的中國交給誰也是辦不好的。……所以我從前總覺政治沒辦法，後來覺得社會沒辦法，最後覺得我自己沒辦法。

……知道一年來經過的，往往覺得五四的時候，我們幾乎覺得做什麼事有什麼人；到了現在，做什麼事也都沒有人，這種情形，也是無可諱。難道以前熱心做事的，現在都不熱心了嗎？難道以前出來的，現在都厭倦了嗎？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人來補充了嗎？這都是不盡然的。須知五四運動的所以成果，並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事前已經醞釀許久了。大家有幾年的郁積，幾年的休息，正是躍躍欲試的時候，陡然一下爆發出來，所以智者盡其智，勇者盡其勇。現在經過一年三久，以前的儲蓄，一齊發洩盡了。加之一年以來，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號，東擊西應，對於新的知識一點不能增加進去，哪裡還有再來傾倒出來的呢？……所以我們若是長此下去，不但人才破產，而且

大家思想一齊破產。

……當五四的時候，大家東謀西劃，都有一點創造的精神，而如今則一舉一動，都彷彿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來，一定要打一個電，或是發一個宣言，或是派幾個代表，而最無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則一方面困於萬能的表示，無論什麼事都有一種表示；一方面又限於思想的破產，想表示也想不出什麼表示的方法。於是於無法表示之中，想出一種無聊的表示。我以為我們此後實在不能再有這種無聊的舉動了。

……我們只知道做「群眾運動」。老實說世界上的運動很多，而群眾運動不過是各種運動中的一部分——並不是唯一的一部分。現在我們把其它的一筆抹煞，而只知道群眾運動，實在錯了。而且做群眾運動必定要知道群眾心理；在中國做群眾運動，尤不能不知道中國群眾的心理。若是不明群眾心理而冒冒昧昧的發動，沒有不失敗的。

……群眾是有惰性的。他們必定要認為只須一舉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各國的成例，舉不勝舉。

……說到群眾運動，當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賴乎極大的刺激。……我方才說我們名為做群眾運動而沒有群眾，實在是很痛心的一句話。不但我一個人做這樣的感想，就是現在所有的學生，哪個不覺得商人不同我們表同情，工人不來幫助我們，農民不來同我們攜手，……鬧來鬧去，什麼「愛國」、「救國」的責任，還是我們學生一界擔任嗎？……雖則他們所以不同我們表同情，不給我們幫助，不和我們攜手的緣故，並不是他們不願，仍然是他們不知。然則何以使他們化不知以為知呢？

使他們化不知以為知，而且要使他們知道之後，能表同情，能給幫助，能來攜手，這就叫做「養成群眾」。「養成群眾」是做群眾運動的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而所以養成群眾的秘訣，只有一個具備的概念，就是——「養猴子的人，必須自己變成猴子。」

有人說我們懂得勞動問題，我聽了不覺失笑。我想我雖然到過多少地方，看過多少工廠，但是想問勞動者三句真正的話都問不出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穿的不是勞動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勞動者的飯，住的不是勞動者的社會，說的不是勞動者的話，……所以勞動者看見我們不是勞動者，不過是穿長衫的「先生」，他們既然認為同他們沒有關係，又不是同他們的同類，所以無怪連三句真話都不肯說了！聽說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學到長辛店去演講，問一個工人的生活豐富不豐富，弄到那個工人瞠目結舌，駭而疾走，這又何怪其然呢！所以真正能養猴子的人，必須身上蒙上猴子的皮，這些猴子才會相信他。

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我常常憤悶起來的時候想到：若西洋人罵我們是劣等民族，我簡直無法否認。你看現在的中國哪裡有一種學問配在世界上說話；說到這裡，我們中國人連印度都不如呢！所以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夠造詣的人，拋棄一切事情都不要問，專門去研究基本的文學哲學科學。世界愈亂，愈要求學問。現在大家是分工的時候，不是萬能的時候了！我以為中國的社會固然是毀壞學者；而我們現在的行為，也是同一樣毀壞學者。即以我個人經驗做一個淺近的比喻，……我的天性是在求學方面比事務方面見長。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誹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沒使我以這番心血，來完成我所想譯的五三部書，我對於中國的文明，比之現在何等貢

獻？偶一回頭，為之心酸。……

總之，我們做文化運動的最後覺悟，是要知道現在中國沒有一群學問，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位置的；無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將來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¹

在更後來的回憶中，幾十年前的種種事態已經塵埃落定，水落石出，羅家倫還有過對五四學生運動的總結，據他的觀察：

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

第二，做第一次學生運動的時候，負責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學生，靜則思動，所以他們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動也很有計劃，但是到後來動久而不能靜，有許多人只知道動而不知道讀書，於是乎其動乃成為盲動。

第三，最初動的學生，是抱著一種犧牲的精神，不是為著出風頭來做這些運動的。因為最初幾個人聲名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於是乎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風頭的最好方法，於是個個想起來動，結果必至於一敗塗地。

第四，政治力量的參入。五四運動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動的。當時只是純粹的青年血氣衝動。到了後來，各種政治的成分都參加進去了，所以往往

1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二卷四號，一九二〇年五月。

起內部的破裂，於是學生行動也就不能一致。¹

這裡的觀察，因為是對比了五四之後學生運動的發展得出的結論，顯示出五四作為一次學生愛國運動典範的純潔和純粹性。但正如當時他們的師長輩蔡元培、蔣夢麟等人已經注意和憂慮到學生運動挾帶的負面因素，蔡元培就給學生們指出，「因群眾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依賴心，精神上的損失也著實不少」。²五四運動之後的許多學生運動，顯然不那麼簡單和純粹了。到運動中權力地位的誘惑之後，學生內部三六九等、魚龍混雜，目的不那麼純粹了，理性沒那麼健全了，出風頭、善煽動的學生倒是很可能占據學生領袖的地位，而各種政治力量對學生運動的利用和爭奪，更是複雜而詭譎。而這些因素在五四運動中，幾乎都是沒有的。五四運動時候的學生領袖，即使也被人指摘過這點那點的不足，但相對而言，他們的確是當時學生中的優秀分子，在運動中自然湧現出來。傅斯年認為，五四運動原是无領袖，不用手段和不計結果的，是自下而上生發出來的社會運動。因而可說是真的社會運動。這一點極具深刻意義。對於當時在運動中的風頭人物，胡適早就盛讚過他那幾個辦《新潮》的優秀學生：傅斯年、羅家倫、顧頤剛等人，是成熟的。這在五四運動中經受了考驗，得到了更明確的印證。五四運動中，學生們目的非常純潔、無私，理解和行動都能一致；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運動一結束，立刻就能反省到相當多的問題，不自欺，不欺人。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2 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新教育》二卷五期。

學問政治

從新潮社到五四運動，羅家倫這一段生命歷程在現代歷史上成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對於他個人來說，內中不無矛盾和衝突，即在學問追求和政治行動間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作怎樣的選擇，保持何種距離。這一問題絕不是只困擾他一個人，或許，羅氏根本還算不得在這個問題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對羅氏影響最大，關係最近的幾個人，比如蔡元培、胡適，比如傅斯年，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這個問題，不是自五四運動之後才出現，乃是此前就在他們議題中出現了的。

在新潮社中，對於《新潮》性質和宗旨的看法，新潮社的不同成員，或者非新潮社的時人，從各自的期待和立場出發，有褒有貶，有所指為一事。傅斯年特別強調《新潮》的「純潔」：「我們是由於覺悟而結合的。……所以我敢大膽著說，新潮社是最純潔的結合。因為感情基於知識，同道由於覺悟，既不以私交為第一層，更沒有相共同的個身利害關係。」¹他所說的這種感情，是學生同道的感情，是基於知識思想而非功利目的的感情。也就是在自覺表明新潮和政治行動之間的距離，希望新潮社能一直保持為「一種極純潔的結合」，一個求知、致知的團體：「至於新潮社的結合，是個學會的雛形。這學會是個讀書會，將來進步，有設備了，可以合伙研究幾件事務。最後的目的，是宣傳一種主義。到這一層，算止境了。我們絕不使他成偌大的一個結合，去處治社會上的一切事件。發布些小冊子，編輯一種人事學科的叢書，一種思想潮流的叢書，一種文藝叢書，和其它刊物，是我們的事業。此外，也沒有我們的事業。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九月。

更為要糟糕的。兩千年專制的結果，把國民的責任心幾乎消磨淨了。所以中國人單獨的行動什九卑鄙齷齪，團體的行動什九過度逾量。這都由於除自己之外，無論對於甚麼都不負責任。……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對於政治關心，有時不免是極無效果，極笨的事。我們同社中有這見解的人很多。我雖心量褊狹，不過尚不至於對於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惡痛絕！然而，以一個人的脾胃和見解的緣故，不特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動的，也屢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樣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種極純潔的結合，而一轉再轉便成政黨的小體。如此一般人的結合，自然沒有一轉再轉的危險。那麼，我們是『專心致志』辦『終身以之』的讀書會了。」¹在內容上，他們也就有了某種自覺的期許和堅持：「《新潮》的將來大約也是宣傳文藝思想，人道主義的，不是個專研究現日中國社會問題的；也是各人發揮各人的主張的，不是有一致的主義壁壘整嚴的。這可就我們同社的情性、品質、知識、興趣上斷出。我覺得我們同社有很多個性主義和智慧主義的人。這樣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總相信天地間沒有一件好物事沒有壞效果的，沒有一件壞物事沒有好效果的。憑我們性情的自然，切實發揮去就是了。」²

對於《新潮》的思想傾向，新潮社的社員俞平伯評價說：「《新潮》和《新青年》同是進步期刊，都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宣傳『賽先生』（即 Science，科學）與『德先生』（即 Democracy，民主），但在辦刊方向上卻稍有不同：一、《新青年》偏重於政治、思想、理論論述；《新潮》則偏重於思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九月。

2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九月。

想、文學方面，介紹一些外國文學。二、《新青年》內部從一開始就分為左、右兩派，鬥爭激烈，直至最後徹底分開；《新潮》的路線相比之下則稍「右」一些。」¹這裡的「右」，也包含了不取政治行動走向的那種態度。另一位非新潮社的時人許德珩說：「在胡適影響之下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俞平伯、徐彥之、毛子水等，辦了一個《新潮》雜誌，後來參加的還有汪敬熙等。《新潮》雜誌在出版時自吹自擂，刊登廣告自稱是『北京大學之《新潮》』。由於胡適的關係，北京大學每月出大洋四百元作為《新潮》的津貼費用。這個刊物主張白話作文，偏重於文字改革運動，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之下，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於反侵略、反賣國的運動卻起了不少的反作用。」²在許德珩的話中，他所謂的「反作用」其實正是《新潮》和政治行動間保持的距離和他們內在的一種自由主義態度。而對於許德珩所加入的《國民雜誌》，羅家倫的態度也可說明這一抵牾：「北大有一部分學生，組織一個國民雜誌社，其中重要的人物是易克嶷、段錫朋、許德珩、周長憲、孟壽椿等，當時，他們也要我加入這個組織，但是我對於這種比較狹義國家觀的刊物不很熱心，而且自己還要專心去辦《新潮》，對於《國民雜誌》，只算是一個贊助者吧！」³羅家倫所不熱心《國民雜誌》的原因，也在於其同政治的關係太近，有明確的政治主導觀念。於是，羅家倫明確區分：「《國民雜誌》裡面的人，多半是實行的人；新潮雜誌社的人，多半是偏重於學術方面的人。」⁴

1 俞平伯：《回憶〈新潮〉》，《北京大學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三二六頁。

2 許德珩：《回憶五四運動》，見北京大學檔案館網站 www.dag.pku.edu.cn，「名人檔案」。

3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4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從新潮社的許多主張看來，受胡適的影響是最深的。《新潮》所秉承和努力實行的，和胡適的諸多主張相呼應。新文學運動自不用說，其他如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等，比比皆是。除了這些具體的內容之外，胡適對新潮社宗旨和傾向的影響則至為重大。在一九一九年九月，《新潮》的二卷一號中，考取山東公費即將前往英國就讀倫敦大學的傅斯年寫了《〈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文中提出了他對《新潮》諸同仁的一個共勉和期許：我希望同社諸君的是：「一、切實的求學；二、畢業後再到國外讀書去；三、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這些期許，和新潮社的「純潔」乃是一以貫之的。而這種期許，直接就可以想到胡適所堅持的易卜生主義：「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¹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便愈應冷靜，也愈應把握時機追求知識，「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為將來救國的憑藉，這是胡適一生所持的堅強信念。傅斯年在這裡提出來對《新潮》同仁的共勉和期許，無一不在呼應胡適的主張，也的確對新潮社諸人後來的走向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影響。至於時勢的巨浪捲過來的時候，秉持這一信念就要比那些行動派艱難和苦澀了。

胡適當然是他所秉持的這種信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自述說：「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七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二卷一號，一九一九年九月。

2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轉引自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八六頁。

月，我回國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¹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陳獨秀被捕，胡適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新文化運動啟動時，不僅是胡適，而是《新青年》同人相約「不批評時政」的。但這一約定並不表明他們不關心政治，而是要從思想文化入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一旦發生如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等關係到賣國、亡國的重大政治問題時，就不能不談。以陳獨秀一貫的勇猛，在回答當時責問《新青年》為什麼談政治問題時，他便說：「本誌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²若完全不關心政治，乃是「涼血動物」，「乃中國舊式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³又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澈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它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⁴陳獨秀毅然地投入行動之後，胡適依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平衡和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其間不無起起伏伏，反反覆覆，但這些曲折，更表明瞭他所堅執立場的不易，自始至終不曾放棄。

對於學生的政治活動，蔡元培的態度不能說完全的否定和肯定，而是一直試圖讓學生保留一個

1 胡適：《我的歧路》，《胡適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四七六頁。

2 陳獨秀：《答顧克剛》，《新青年》第三卷，第五號，一九一七年七月。

3 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一九一七年七月。

適當的度。以蔡自己的革命精神，他未嘗不理解學生的滿腔愛國熱情。一九一八年，蔡元培為學生刊物《國民雜誌》撰稿時寫道：「讓學生們承擔國民的義務是《國民雜誌》宣揚的觀點。但是如果學生的職責僅僅是讀書的話，他們又怎能犧牲用於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去承擔平民百姓應有的義務呢？答案是：學生是被他們自己拳拳的愛國熱忱所驅動。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民眾對國家的命運漠不關心，似乎國家的前途與他們毫無關係，但還是有一部分社會中堅把為國家服務視為己任。理解這種愛國情操並真誠地為國家強大而努力奮鬥的人畢竟只占少數。如果學生不能幫助這少數愛國志士去喚醒麻木的民眾，那又有誰能行呢？學生們寧願犧牲自己的學習時間和精力來辦好這個志在救國的雜誌，他們的誠摯不能不令人欽佩。」在這一點上，他保持的信念和胡適非常一致，他說，「讀書不忘救國」，但緊接著就是「救國不忘讀書」。他對學生關心政治與其說並不反對，毋寧說非常同情，但這與贊同和鼓勵政治「行動」則全然有別。

茲看他個人的陳述：「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

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宣傳政府將明令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鑽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選；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絕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¹

蔡的陳述中避過了諸多隱衷。「其時，由於京城政治圈內一些官員也或多或少同情學生，迫使總統徐世昌、總理錢能訓無法完全聽從段祺瑞擺布，安福系、新交通系壓制學生的計劃因而不能實現。五月七日，三十二名被捕學生獲釋。不久，親日官員也只得引咎辭職，上海和其它地方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至此，大家都以為事件已經勝利結束。然而，蔡元培則因事情鬧大了，深感到意外，特別為營救學生得罪了當權的親日派，京中又嘩傳政府將明令免其校長之職，為緩和親日派的憤怒，蔡元培不願因個人去留致使事態進一步擴大，於是，蔡元培五月五日遞交了辭呈，八日聞已允辭，別任馬其昶為校長。得此訊後，蔡元培擔心這一消息發表後，學生會拒馬氏到職再起風波，

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誌》三十一卷一號，一九三四年一月。

增加學生與政府之間糾紛，自己則有把持地位戀棧之嫌。同時，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復追究也。』¹於是蔡元培於五月九日剃掉長鬚悄然離京，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已正式辭去。」典出《風俗通》：「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蔡元培以被殺之馬自喻，實表達了來自各方的期許和壓力已經使他疲於應付的倦怠心理。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後俏抵杭州。決意不再回北大。²對於蔡元培當日處境，可能那時候許多做過大學校長的人都頗能體會，馮友蘭就曾在其自述中說過這樣一段：「從五四運動時候起，在學生中，特別是大學學生中，抗日救亡的運動陸續發生，當時稱為『學潮』。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趙家樓事件就是當時的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學潮。在學潮中，學校負行政責任的人和學生之間出現了尖銳的矛盾。這些負行政責任的人是當時的政府任命的，他不可能公開地同學生站在一起。但是他們和學生們又是師生的關係，站在這個關係上，他們對於學生又有愛護的責任。況且學生的主張，也往往是他們所贊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可以採取中立的態度，雖不公開地同學生站在一起反對當時的政府當局，也不同政府當局站在一起暗中迫害學生，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採取的就是這樣的態度。在趙家樓事件發生以後，一部分北大同學被軍警逮捕。他一面派人設法營救，一面就宣布辭職，不辭而去了，僅只留下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後來學潮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影響越來越大。北大、清華的校長所採

1 裴毅然：《蔡元培的「決門」》，《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2 裴毅然：《蔡元培的「決門」》，《書屋》二〇〇五年第三期。

取的基本都是這種態度。我在清華，也是採取這種態度。」¹

可事情還沒有完，北大學生認為蔡校長乃被逼離京，學潮再起，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罷課請願，力促政府迎還蔡元培，懲辦親日官員曹、陸、章等人。且罷課舉動迅即獲得全國各地學生響應，事情再次鬧大。北大學生屢派代表至杭，力勸蔡元培回校。但這次雖經多方敦請，蔡元培「謹謝不敏」，依然不肯北歸。對此，他的助手蔣夢麟先生在《西潮》裡披露了蔡更深一層的態度：「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²北大自此之後發生的不少問題，證實了蔡元培的遠見。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胡適正在上海迎接杜威夫婦。運動發生後他隨即北返，五月九日與陳大齊、沈士遠、劉半農三位老師，以及羅家倫、狄膺等三名學生同赴警廳交涉釋放被捕學生。胡適雖然同情學生的訴求，卻認為這場運動也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不僅破壞了北大的教學制度，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進展，也促使他放棄了「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初衷。他於是說，從那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帶著他們都不能脫離政治了。一九二〇年四月，羅家倫

1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二九〇頁。

2 蔣夢麟：《西潮》，《西潮·新潮》，岳麓書社二〇〇〇年版，第一三二頁。

為《晨報》籌編「五四紀念增刊」，向蔡元培和胡適等教授約稿，特別央請胡適為「旁皇過路」的學生「拿出正當的主張出來，做一個燈塔」，並請他「多找幾位朋友擔任，最好能代表各方面之意見者」。胡適這次撰寫的評論對學生的行為表示同情，他說：「在變態的社會裡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同一天他與蔣夢麟共同發表的〈我們對學生的希望〉裡面進一步強調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社會裡不得已的事，但是他是很不經濟的不幸的事。因為不得已，故他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是暫時不得已的急救辦法，卻不可以長期存在的。」學生運動之後，胡適始終是個公開的「復課派」。他對學生說：「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於是，五月號的《新潮》上，羅家倫寫下了一篇文章：〈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的應取的方針〉，文中他承認了學生運動的失敗之處，在於「學生產生了萬能的觀念，導致了學術的停頓，行為落於形式的巢穴」。所以，五四運動之後沒有多久，羅家倫等這些同胡適接近的學生，也就很快意識到重新回到學業的重要性。¹

一般想來，中國讀書人，尤其是儒家士人的傳統裡，就理想狀況而言，高深學問與社會責任之間從來就是兩者兼顧，不可偏廢。但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當遭遇那些政治艱危的時代，社會責任

1 參見羅久芳：《胡適與羅家倫》，臺灣，《華美族研究集刊》第六期，二〇〇三年。

的突顯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時候，高深學問和社會責任之間就會矛盾突顯。五四一代無疑遭遇到了這樣一種歷史時勢。顧頡剛晚年回憶起自己當時的想法時認為，他們都是文學院的學生，只想埋頭寫些文章，不願意搞實際的活動。他記得羅家倫在《新潮》二卷一號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古今中外的學說〉一文，對他曾產生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他當時很贊成羅家倫那種只鑽研學問，不問外事的說法。毛子水後來在一篇回憶五四運動的文章中，也說了類似的話：雖然民國成立已有八年，國事愈來愈壞，而大家卻只專心讀書，不問政治。如此看來，今天我們眼中捲入政治最深的五四一代北大人，當時則為能遠離政治，埋首學問而著實彷徨不安過。事實上，五四那一代北大人最後的走向與歸宿，最突顯的也便是高深學問和政治事功間二者擇一。試圖在兩者間保持平衡者，例如胡適，必須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承受更多矛盾和衝突，而且也常常在失掉平衡的邊緣。在這種分歧的最初起點，或許有很多人並不曾料想自己將來被時勢所捲入的程度會那樣深。就是我們今天人看來，那一代人的命運也實在太多戲劇性的成分。所謂「時勢造英雄」。五四其實已經很難說是一個可以造就英雄的時代，但那的確是中國知識分子還能以群體方式短暫占據歷史舞臺的一段歲月，尤其是還能在政治上直接地有所作為。就個人命運來說，他們也是無可避免地深深捲入了時勢的巨流之中，在政治的驚濤駭浪裡，他們當然搏擊過，但也因之沉浮不定、命運多舛。

今天把傅斯年與新潮同仁共勉的那些話重新放入歷史的語境當中，實可以感受到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的一種張力。這一張力的核心是思想文化和政治行動間的張力。對當時處在政治權力中心場域的北京大學來說，這種張力自始就不曾減弱過，在中國現代史一波又一波政治風雲、國家危亡的激盪中，還常常激化；甚至由於各種政治力量的涉入，更是複雜異常。就五四運動而言，時

勢造成現代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短暫地占據了歷史舞臺，新文化運動中的小將們，同時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對於當時北大學生中重要的兩個社團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羅家倫如是說過：「《國民雜誌》裡面的人，多半是實行的人；新潮雜誌的人，多半是偏重於學術方面的人，所以五四運動發生以後，學生會裡面組織分為七股，各股的主任幾乎是《國民雜誌》和新潮雜誌二社的人平分的，這兩個雜誌，所以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基礎。」¹也許對於「《國民雜誌》裡面的人」來說，因為團體性質本來傾向於行動，所以在新文化的思想文化性質和五四運動的政治行動的性質之間的張力不會有新潮社諸人感受那麼明顯。但總的說來，五四之時，這種「純潔」的性質還未遭到嚴重的挑戰，只是顯明出來而已。羅家倫未始不是這種宗旨的支持者，但在當時的風潮中，作為學生政治運動的主力之一，他是相當積極的，同國民黨政治人物的接觸也包括其中。

書法家蕭勞作為時人，在他對北大的幾點回憶中有一段專門寫到羅家倫，說羅家倫在五四運動中是個風雲一時的人物。但羅家倫追逐名利權勢，當時就為同學所不齒。他記得五四後的一天晚上，在法科禮堂的學生集會上，羅家倫大肆吹噓自己，引起與會同學不滿，說他「沽名釣譽」、「風頭主義」。一位同學還走上去把羅氏推下了講臺。又說，羅家倫當時是北大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卻暗中到太平湖安福俱樂部參加段祺瑞的宴會。有些北大同學得知此事，畫了一幅羅在宴會上拿著刀叉吃大菜（西餐）的像，加了注解，貼在北大西齋壁報欄上。同學們看了都很氣憤。有位同學寫了四句打油詩諷刺羅：「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意旨無恥）。」這四

1 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一九七八年五月。

句打油詩在北大廣傳一時。還說羅家倫曾給蔡元培校長寫過信，請求和蔡先生的女兒訂婚。蔡先生復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無權包辦。況小女未至婚齡，你之所未免過分。這件事在北大傳為笑談云云。¹這些東西，對羅的譏諷可謂不淺。且不論對羅這種評價是否得當，但可以從中想見羅家倫確有些風頭過甚，以致招人譏諷。同政界人物的交接，尤其惹人反感。對當時社會上盛傳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一事，他們的師長胡適則絕對信任這兩個高足的品質。胡適在《他也配》中輕蔑地說：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為著愛國救亡的熱情，誰也不懷疑，有些事情上被他人誤解也是有的。不過，人在那種政治權力的場域中，一個年紀輕輕，尚無多少經驗和判斷力的人，頭腦一時發熱，恐怕也在所難免。其實往後看，羅家倫頗能於事功，他且不屬於深沉、內斂一類人，他個人性情中的某些因素不免起了些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事後他即能反省，接著便收心立志，依著胡適、傅斯年所倡議的路子，到國外留學去了。

但是可資對比的極端的例子，是和羅家倫同時赴美的康白情。留在現代文學史裡的康白情，是早期新詩的一個代表人物，而且是同時代新詩實驗中最成功的新詩詩人之一。但此人在後來的文學史中卻銷聲匿跡。這種情形並非個例，卻很少人想到這背後一個個體奇特的生命歷程。康白情是一個詩人，同時還是極為活躍、熱心政治的行動者。兩個似乎抵觸的面相結合在了一個生命中。康白情與羅家倫一樣是以穆藕初獎學生赴美的學生之一。他到了美國，不寫詩了也不忙讀書，卻開始搞

1 參見蕭勞：《我在北大的幾點回憶》，《文史資料選編》第二三輯，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他的政黨政治。不斷與在美的「少年中國」積極分子聯繫，經過日本時與日本共產黨聯絡，到美國又與美國共產黨聯絡。他的家庭四川安岳為四川袍哥勢力中心之一，他少年時期便混跡幫會。到加州後即加入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一九二三年七月拉上加州大學幾個中國同學入伙，發起了一個新的以幫會為基礎的政黨——「新中國黨」，此時康才二十八歲，竟然自己出任「黨魁」，並立即在西方各地的唐人街發展組織，在上海、北京等地設黨部。康白情以領袖身份回國「指導」，把在加州大學四年學業拋到九霄雲外。但是此「政黨」既以華僑為基礎，康白情一回國，就此土崩瓦解。「自己的政黨」消失之後，康白情既無法回美國繼續學業，又無法投效北伐，只能回到四川老家，投靠軍閥劉湘為幕府，此時染上煙癖，一生做官、經商、弄文學，均一事無成。二十世紀四〇年代末，到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一九五八年成為右派分子，退職返鄉。船次途中，未進三峽即病死於湖北巴東。¹

羅家倫在歷史的冊頁裡，總之是個政治積極分子的形象，就事功與學問來說，無疑要被歸入以事功勝之列。正如沈剛伯說：「志希先生是陳同甫一流的人。」²從五四運動那一個旗手的形象開始，到後來成為國民黨文化官僚、政務官僚，在他的同輩人中，他或許不是在政治中心的人物，但也是和政治關係較為密切的一類，而且始終沒脫離過黨派政治。這一點上，他和北大時期還同調的胡適、傅斯年這些師友，大概就有些漸行漸遠了。但遙想當年的羅家倫，也有過不問政治，專心讀

1 參見趙毅衡：《對岸的誘惑·五四時期北大英才怎樣留學》，知識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轉引自《五四英才怎樣留學》，《文匯報》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2 沈剛伯：《悼念羅志希先生》，臺灣，《中外雜誌》第七卷，第三期。轉引自《羅家倫傳記資料》。

書的建議，在五四運動之後反省當中，對在學問追求和政治行動上的看法和胡適、傅斯年全然一致，甚至在對自己的評價裡尚且還認為自己的天性是在求學方面比事務方面見長。隨著時勢變遷，風雲突變，不知羅家倫是否從捲入五四風潮以來，不知不覺中轉變著自己的想法，也許他自己都未曾明確意識到。他後來的生命歷程無疑越來越傾向要在事功上成就自己。且不說那時候他對政治抱有的期望如何，但在那樣一個時代風潮和他個人所面對的境遇面前，他無疑是積極接近政治的。那一代文化人遇到了政治力量主動來靠近他們的時代境遇，在那樣的年齡，面臨那樣的時勢，很少人能有足夠的成熟、冷靜和先見之明。於是，他們的選擇以及由此展開的生命線索也帶上了很多時勢的色彩。

在羅氏個人關於那段歲月的回憶抑或臺灣研究羅家倫五四生涯的文章中，通常都不忘記在五四運動後他出亡上海那幾個月中同國民黨人的交接，尤其是見到了孫中山。其意味甚明，乃是要把其北伐後進入國民黨政治生活的前緒上接到五四時候的「革命活動」和「革命精神」。茲見羅家倫後來的記錄：「五四那年我曾代表北京學生到過上海，第一次同其它兩位代表一起謁見國父，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和他劇烈辯論三個鐘頭，而他始終娓娓不倦，越辯越起勁，硬是要說服我們！」¹同張繼的交情則被迫溯到一九一九年四月間，張繼與新潮社通訊，羅家倫曾代表新潮社答覆他。這次他在上海則同張繼一見之下成為忘年之交：「我在上海初次和他（張繼）相遇時，看見他提起凝重的獅子步伐，移動一副厚重的身軀，蓋著一頭黑壓壓的頭髮，射著一對炯炯發光的眼睛，

1 羅家倫：《五四的真精神》，《文存》第一冊，論著，第三一七頁。

卻說出些簡單直接，天真而又熱情的話，覺得他是我們的朋友，於是成為忘年之交。」¹戴季陶和朱執信是羅家倫的文字交，羅家倫在上海復旦公學讀書並主編《復旦季刊》時，就與戴季陶「簡短地晤談過幾次」。這次羅家倫來到上海，他們又見面了，羅家倫還說到戴季陶曾使他「惶恐到不知所措」的一件事：「在滬期間，我和季陶先生與朱執信先生因為文字上的因緣，談天的機會頗多。那年的除夕，《民國日報》舉行全體員工一道聚餐，當時還屬創舉，不知何故，我以外客的身分被邀。只是季陶先生豪興百倍，酒多話多。他於酩酊之際，不知何故，聽到我說了一句話，認為不無可取，於是突然對我磕了一個頭，使我惶恐到不知所措。」²這些東西的聯繫，當然是帶上了後來的政治色彩，但無意中也向我們透露出五四學生中這些領袖人物當時面臨的各種政治力量，不說是政治誘惑，但也確實有各種政治力量頻送秋波。這種追根溯源可以看做是事後的攀附，但未始不是他們得以更接近實際政治的開始。那個時代本身就是政治上你來我往，風雲際會的歲月，懷抱救國理想的許許多多人都都在試探、在尋求他們的道路，對於這些五四運動而初試身手的年輕學子中的優秀分子來說，也未嘗不是這樣。

1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四一頁。轉引自陳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羅家倫傳》，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五〇頁。

2 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文存》第十冊，記傳，第一六三頁。